

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 ——以江南為討論中心——*

巫仁恕**

摘 要

本文嘗試由三個角度來探討明清兩代的文化是否連續或斷裂的問題：第一，從旅遊文化史的角度來分析，晚明時在士大夫階層中達到空前高峰的旅遊風氣與文化，從明清之際到康熙末年以後，由衰退走向再興的過程。由此可見，清廷入關並沒有完全阻礙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發展。然而這並不代表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文化，完全承繼晚明的特色，因為兩者之間仍有許多的差異與變化。

其次，就士大夫旅遊活動的外在變化而言，本文分別從旅遊的地點、食宿、交通工具、攜帶的器具等方面作探討，結果顯示清代旅遊消費的商品化現象，較晚明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在許多技術層面並沒有革命性的突破。

第三，雖然明清兩朝政權轉移與異族統治等「斷裂」的表象之下，並沒有完全阻礙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發展，然而從文化內在變遷的角度來分析，則顯示清人的遊記書寫相較於明人有截然不同的轉變。晚明士

* 本文係院內主題計畫「明清的社會與生活」子計畫之研究成果，初稿曾於本所之學術討論會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之「過眼繁華：明清江南的生活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年12月)中宣讀，惠承評論人沈松僑與嚴志雄二位先生，以及多位同仁及與會學者多方指正，獲益良深，謹此致謝。修訂與送審過程中，復蒙兩位審查人的詳閱與指正，特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05年4月15日，通過刊登日期：2005年7月26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大夫遊記中所呈現的雅俗區分與品味塑造的論述，在清人的遊記書寫已不成為主流，而是轉向知識性的「考古」論述。反映清代士大夫在休閒旅遊之外，重視知識探索的旅遊風氣崛起，並逐漸成為當時的主流論述。這股潮流可能影響到晚清的經世之學。

關鍵詞：明清、士大夫、旅遊文化、江南、遊記書寫、旅遊論述

前 言

旅遊活動在中國的歷史出現很早，到了明代，尤其是晚明時期，旅遊風氣可說是盛極一時。前此筆者曾為文討論過晚明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旅遊文化，¹但是入清之後，士大夫的旅遊文化的研究卻少受到注意，研究成果的數量尚不如晚明的研究，²實則清代的遊記數量遠超過明代。本文擬利用清代的遊記，再配合其他的筆記史料，探討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文化。

本文的目的，是從長時期的角度，分析士大夫階層在旅遊的消費文化，特別是明、清兩代之間所發展的變化。關於明、清兩代的文化是連續或是斷裂的問題，是近年來明清文化史探討的重要課題之一。關於此問題的討論有許多不同的面向，傾向明、清文化斷裂與不連續的學者，有的從士大夫的物質文化與消費方面作分析，主張晚明鑑賞品味的文化到了清代逐漸消失，因為到了清代，伴隨著身分等級與地位認同制度的重建，物品消費的象徵意義漸弱，而且晚明「消費社會」(consumer society)的發展，也因為缺乏「關鍵大眾」(critical

¹ 拙作，〈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收入熊月之與熊秉真主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5月），頁225-255；〈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1（2003年9月），頁87-143。前言以下有關明代旅遊文化部份的敘述，大抵皆立基於此二篇之成果。

² 除了通論性的書籍外，僅有的少量研究都是論明清二代，並不專論清代，如陳建勳，〈明清時期的旅遊消費及其支出——以長江三角洲為例〉，《消費經濟》，2000年第4期，頁63-65；陳建勳，〈論「游道」——明清文士旅遊觀研究之一〉，《旅遊學刊》，2000年第4期，頁64-68。以個別城市為例，探討清代士大夫旅遊活動和景物(landscape)的關係，最佳的例子是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有關揚州王士禛與紅橋的研究。參見Tobie Meyer-Fong, "Making a Place for Meaning in Early Qing Yangzhou," *Late Imperial China* 20:1(June 1999), pp. 48-84.

mass)而停止。³也有學者從士人文化活動與道德規範的角度指出，無論是生活型態或文化活動，於明末清初都起了很大的變化，例如對個人道德修養的重視，取代了過去「浮囂奔競」的習氣，而結社、講學等活動也漸漸消逝，這些現象都說明了明、清文化的斷裂與不延續性。⁴另一方面，主張明、清文化連續性的學者，有從情慾文化的角度，來分析明、清庶民文化中的延續性，發現十八世紀仍流行許多情歌與戲曲選，顯示晚明的情慾文化仍然在現實生活中流傳，故而主張不能太高估清代禮學家改良庶民文化的成效。⁵中國大陸明清史學界的「資本主義萌芽」論中，也有學者否定清朝「康乾盛世」，認為明代中國已經發展到了近代化的門檻，相對落後的滿人入主中原後，將明代的發展成就摧毀殆盡，導致近代中國的落後。近來有學者全面地從文化、學術、政治觀念與社會等角度重新評估此一論調，主張清代的發展許多方面「都在明朝基礎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⁶

本文嘗試由三個方向來探討此問題：第一，從旅遊文化史的角度來分析，晚明時在士大夫階層中達到空前高峰的旅遊風氣與文化，入清之後是否因為清廷的政策而阻礙了士大夫旅遊文化與旅遊活動的發展？

其次，就旅遊活動的外在變化而言，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和明代有什麼差異？明代的旅遊文化在交通與食宿方面，已經可見相當程度的商品化，甚至出現相當於近代所謂的「套裝行程」。此外，晚明士大夫的旅遊活動也呈現了

³ 參見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pp. 169, 173. Pomeraz 也認為清廷有效地恢復了社會秩序以及菁英階層的身分制度，已經足以使「特許體系」再度復甦，因而在某種程度上減緩了流行「時尚」的發展速度。見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54-156。

⁴ 王汎森，〈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9 本第 2 份(1998)，頁 256-260；〈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周質平、William J. Peterson 編，《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頁 441-451。

⁵ 李孝悌，〈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的情慾與身體：禮教世界外的嘉年華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2 本第 3 份(2001)，頁 543-595。

⁶ 高翔，〈近代的初曙：18 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舒適性與娛樂性的特點。例如在地點選擇上以中、短距離為主，而不是遠距離的冒險式旅遊。他們都很重視乘坐交通工具的舒適性，旅遊時的器具也很齊全，且不全都是必需品，而包括茶、酒等奢侈消費品。從他們旅遊時攜帶隨從與歌妓等行徑來看，旅遊已成士大夫們重要的娛樂活動。而清代比起明代是否有進一步的發展？又該如何評價呢？本文的第二部份，就士大夫實際旅遊的地點、食宿、交通工具及攜帶的器具等方面作探討，並且透過十七、十八世紀來華西人的記載，來比較與評估中西旅遊的發展。

第三，從文化內在變遷的角度來分析，清代士大夫的遊記書寫，在論述方面有什麼樣的變化？這樣的變化是否反映了明、清二代在文化結構上有本質上的變異？從晚明的遊記中可以看到許多士人階層創發了不少旅遊論述，諸如強調雅與俗的區別、提倡「遊道」來塑造旅遊的品味理論、創新精緻的「遊具」以具體化品味，這些論述都反映了他們極力想要創新旅遊品味，以區分其與大眾旅遊不同的心態。這種品味的論述，在清代的遊記書寫中是否有變化？如果有的話，那麼旅遊論述的變化又反映了什麼？在此擬從明清遊記中談及「古」的相關論述出發，嘗試理出一條變化的脈絡。

又因為清代遊記的作者以江南士人的比重最高，所記載的旅遊活動也以江南地區人們的旅遊活動為大宗，所以本文的討論以江南為中心。

一、清代士大夫旅遊風氣的形成過程

（一）清初期士大夫旅遊風氣的衰退

從明清鼎革之際到清初康熙 22 年(1683)清廷擊潰台灣鄭氏為止，這段期間因為戰亂頻仍，阻礙了旅遊路線，使得晚明以來士大夫盛行的旅遊風氣萎靡不振。蘇州吳江人潘耒(1646-1701)在〈遊羅浮記〉中指出，過去從中州（河南）來嶺南者，必定要一遊羅浮山，然而到清初，問中州士人羅浮山作何狀，則多不能回答。

其原因是：「第言兵燹後，山中道梗，泉石榛蕪，益十無一至者焉。」⁷朱書(1654-1707)〈游歷記自序〉中對當時的情景有很生動的描述：

少時侍先大人，聞崇禎之季，流賊蹂躪中原，行數十里，皆不能達，伏莽草，竊乘時起，一出門即恐犯不測。賊至竄草中，聲息惟恐聞，兒啼則閉其口，輒至死，猶不免俘掠，地荒連數千里無人煙，人聚山砦以守。山東、河南北多響馬賊，行者聞箭如鴟叫，急下馬立俟盜至，罄所有奉之乃去。又歲大饑，孤客行道中，童孺女婦能取之以為糧，蓋游之難如此。⁸

引文描述的背景主要是華北地區，江南雖未受流寇波及，但是接下來的南明政權、江南抗清、鄭氏攻南京諸役皆不能免，受害亦深。這段期間，甚至有旅遊者因戰亂無法歸鄉的情形。明清之際流傳許多孝子的故事，其中就有不少孝子「萬里尋親」的例子。例如在《池北偶談》有一則冷孝子的故事，敘述其父冷植元，性喜好遠遊，卻在崇禎12年(1639)出遊之後，遇到明清鼎革，兵戈阻絕三十年，孝子遂發憤萬里尋父。⁹

晚明許多著名的旅遊景點因為戰亂遭到破壞。例如，蘇州崑山人徐乾學(1631-1694)在遊普陀峰時，當地人就說：「自近歲駐兵，千尋古木，率被斬伐，往時經此，雖盛暑不受炎蒸也。」¹⁰特別明顯的是，江南大城市內及近郊盛行的園林更形頹敗，由於明清之際，城市成了兵家必爭之地，使得這些園林遭到極大的破壞。如常州武進人邵長蘅(1637-1704)在〈東臯園記〉一文中，談到該園在縣城之東北隅，初名「東臯」，在明代曾是「曹尚書」故第，「鉅麗甲於一時，歌舞聲伎之侈，悉與園稱。」但是，「乙酉軍興時，籍之為兵使者署，

⁷ 〔清〕潘耒，《遂初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康熙刻本印，1995）（以下略編者），集部，別集類，冊1417，卷13，〈遊羅浮記〉，頁603。

⁸ 〔清〕朱書撰，蔡榮昌、石鍾揚點校，《朱書集》（安徽：黃山書社，1994），卷5，〈游歷記自序〉，頁92。

⁹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0，〈談獻六·冷孝子〉，頁238-239。

¹⁰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康熙刻本影印，1995），集部，冊243，卷25，〈遊普陀峰記〉，頁23a。

園寢以圯。」¹¹這種情況亦見於華北，如《曹南牡丹譜》的作者描寫，他曾於康熙 7、8 年間(1668-1669)遍遊山東曹州府內的名園，觀牡丹花開之美景，但「屢遭兵燹，花木凋殘，不及往時之繁。」¹²

晚明喜好旅遊的士大夫到了此時，多放棄了過去的嗜好。如王士禛(1634-1711)在《古夫于亭雜錄》中提到的臨朐人傅國，明季爲戶部郎中，督餉遼東，待其罷官歸鄉，卜築雲黃山中，「自作傳刻兩扉上，中作一樓，名凝遠，聚書萬卷。」他退休後最喜歡的事是：「每春時出遊，乘肩輿，去檐帷，進賢冠，朱衣束帶，遍歷村墅。」可是到甲申鼎革之後，卻足不下樓，不再從事旅遊活動了。¹³又如山東益都人王若之，曾在南京任官，「放情山水，買舟游武林，窮湖山之勝。」但乙酉之變後，避亂蘇州，獨二舟載古物書畫，寢食與俱，後死於金陵。¹⁴

明、清之際雖是戰亂頻仍，但是仍有士大夫留戀於旅遊活動，從王士禛的《池北偶談》一書中可以看到不少例子。如南海人屈大均(1630-1696)，「少爲諸生，有聲。旋棄去，學浮屠法，釋名一靈，字翁山。居羅浮久之，出遊吳越。又數年，忽加冠巾，遊秦隴，與秦中名士王無異弘撰、李天生因篤輩爲友，作華嶽百韻詩。」¹⁵清初大儒孫奇逢的門人高鏞，「嗜酒，好遊名山水，自負鎚鑿，每得詩，必題石，手鐫之。常游林慮，竟日忘返。」¹⁶又如明季冒闖疆之好友戴重之子戴本孝(1621-1693)，王士禛描寫他詩畫皆超絕，「嘗在京師，夜

¹¹ [清]邵長蘅，《青門簾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青海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1997)(以下略編者)，集部，別集類，冊 247-248 之《邵子湘全集》，卷 9，〈東臯園記〉，頁 3b-4b。

¹² [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8，頁 160。

¹³ [清]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 5，〈傅國逸事〉，頁 121。此時期士大夫不從事旅遊和「不入城」的現象，有共同的社會背景；雖然後者的意義代表士人不承認新的政權，或出於悔恨捨離的意識，但是當時戰亂形成了旅遊與城居的危險性也是客觀的現實。參見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爲——不入城、不赴講學、不結社〉，收入周質平、William J. Peterson 編，《國史浮海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頁 426-430。

¹⁴ 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91。

¹⁵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 11，〈談藝一·粵詩〉，頁 250。

¹⁶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 11，〈談藝一·高鏞〉，頁 258。

與友人談華山之勝，晨起，即襪被往遊，其高曠如此。」¹⁷還有個吳中詩老徐波，仰慕宜興山水而流寓數年，又曾往遊天台、雁蕩諸名勝，「每登臨，多懷古詩。」明亡後居蘇州天池山麓，結廬稱落木菴，與中峰、靈巖二高僧往還；自稱：「喜登陟，而筋力遽衰。未廢吟詩，而發言莫賞。」¹⁸這些人仍然難忘情過去與名士、高僧為伍，同遊名山大澤的美好時光。需要說明的是，明、清鼎革之後，有些明遺民反而悠遊山水之間，但是這些人都是棄諸生、棄家，或隱而不仕者，旅遊對他們而言不似晚明的休閒活動，而是一種逃避的消極行為。¹⁹

清初的這些士大夫，有的是明遺民，有的是在清代受教育者，除了個別旅遊之外，部份士大夫仍延續著晚明士大夫結社旅遊的活動，但是在他們所作的遊記內容，對於景物的描寫多帶有幾許悲涼的感慨。如蘇州長洲人尤侗(1618-1704)的〈遊虞山記〉云：

辛巳暮春，錢子方明有臨社之盟，期於拂水巖；十五之夕，余與沈子石均、章子允文、湯子卿謀，賣一葉鼓行而東，泊於齊女關，四子連牀夜臥，窗外雨聲，湛湛不休，胸中作惡，……因蹴三子足，與談古今史書天下大事，及齊魯饑荒、晉楚盜賊之變，相對慷慨，鼓三下，始睡去。²⁰

在《柳南續筆》一書中記載了一則清初士人旅遊集會的故事，主角是松江府華亭縣人金是瀛，字天石，自少便以詩文聞名，「清初與同里吳騏、王光承並以隱逸徵而不起，時論高之。」當時松江府人文鼎盛，奉該郡某禮部尚書為盟主，而尚書亦屢至該地。一日，舟次旅遊勝地白龍潭，諸名土方群趨附和，金是瀛忽寫一詩贈尚書，內云：「畫舫滄江載酒行，山川滿目不勝情。朝元一閉千官

¹⁷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11，〈談藝一·二戴〉，頁254。

¹⁸ [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台北：明文書局，1985），卷470補錄，〈隱逸十〉，頁1a-2a；[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11，〈談藝一·徐波〉，頁255。

¹⁹ 有關這些人的資料參見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彙輯》一書。

²⁰ [清]尤侗，〈遊虞山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四）》（上海：中華書局，1924），卷16，頁37-38。

散，無復尙書舊履聲。」尙書得詩之後默然不語，當日即刻離去。²¹這則故事描寫的是詩社旅遊的情景，結果是被金是瀛的一首感慨明亡又帶有諷刺的旅遊詩，鬧得不歡而散。這種結社旅遊的活動，隨著清初士人結社風氣的衰微，以及清朝禁止結社的政策而逐漸煙消雲散。

（二）清中期士大夫旅遊風氣的復興

1. 士大夫旅遊風氣轉盛

到了康熙朝後期，約當十七世紀末葉，因為清朝政權漸漸穩固，經濟也漸復甦，士大夫旅遊風氣逐漸恢復。過去在明清之際因兵燹而毀的旅遊景點也陸續修復，就像徐乾學在〈遊普陀峰記〉中所云：「予惟天下名勝之境，遭遇兵燹者，不可勝數，而載在圖經，傳之後世，既廢之後輒復脩舉，皆賢士大夫之力，而四方來游者之厚幸也。」²²地方的紳士在這方面貢獻頗多，舉個實際的例子，遂安人方象瑛（康熙6年進士）在〈遊鴛鴦湖記〉一文中，提到嘉興府城南數里的鴛鴦湖，俗名南湖，廣數十畝，澄波蕩漾，舟楫往來，向為遊覽勝地。其間的真如寺，乃唐司空裴休舍宅，後易名為真如塔，明末曾毀於兵，經里中紳士釀金重修後，已是「丹碧輝映，鈴鐸乘風鏗鏗然。」²³

旅遊對士大夫所具有的正面功能，再度得到重視。如先世本吳人，出生在順天大興縣的劉獻廷(1648-1695)，19歲後移居蘇州吳江30年。他在《廣陽雜記》中就說：

余自幼有五岳之志，自壬申之春，始登衡山，上祝融，望七十二峰，紀遊覽當自此始。雖然，昔人五岳之遊，所以開擴其胸襟眼界，以增其識力，實與讀書、學道、交友、歷事相為表裏，而有顯祕之殊，為益于語言心思之表，故其益益大。²⁴

²¹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4，〈金天石〉，頁201-202。

²²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卷25，〈遊普陀峰記〉，頁24a。

²³ [清]方象瑛，〈遊鴛鴦湖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五）》（上海：中華書局，1924），卷19，頁15-16。

²⁴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57），卷2，頁96。

士大夫致力於旅遊的例子愈來愈多，似乎已回到晚明的水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較著名者像潘耒、邵長蘅、浙江錢塘人袁枚(1716-1797)、常州人趙懷玉(1747-1823)、安徽桐城人朱書與姚鼐(1731-1815)等人，無論是自己的作品或其傳記，都常稱是「性好遊」、「性好山水」、「足迹半天下」。在此之後，大量遊記文體的創作出現了。當然也有士大夫並不好此道，在好遊的士人眼中成了異類。²⁵

清代官員於宦途中從事旅遊的情形，與晚明一樣頗為普遍；²⁶但和明代不同的是，清代官場流行著一股招待旅遊的風氣。如喜好旅遊的潘耒雖然沒有顯赫的官銜，但是因為他名聲很大，所以他在旅遊時總有地方官邀約，或與之同遊，或為其安排旅遊行程或交通工具。如他在〈遊廬山記〉與〈遊南岳記〉二文中，談到他旅遊時有當地的縣令為他僱輿夫，共同旅遊訪友。²⁷又〈遊林慮山記〉一文中，還描寫他在旅遊時，不但有縣令遣人送山輿，親自策馬來迎，而且這位知縣還帶著很多僕從與廚師隨行，²⁸這樣的待遇並不少見。再舉幾個例子來說明當時的風氣，如四川綿州人李和叔，負不世之才，性又好遊，其近鄉峨嵋諸勝皆已遍涉，「年甫三十，入翰林，翰林一官清華多暇，遂以甲辰歲重為岱遊，其兩至也，相距十載，皆有賢守令為之主。」這位年少得志的官員，每到之處都賴地方官員為他安排旅遊行程，甚至還要府同知為他的行程畫圖。²⁹

²⁵ 如王士禛友人吳君，順治末進士，曾游杭州，宿留數月始歸；士禛詢問他是否遊西湖等諸名勝，皆答不知，且大笑曰：「吾跋涉水陸二千餘里，豈為山水往耶？」士禛與其兄言此事，皆以為此人嗜好與眾士人大相逕庭。見〔清〕王漁洋，《香祖筆記》（台北：廣文書局，1968），卷10，頁9b。

²⁶ 此現象早在康熙初年就有，如鄭日奎在〈遊釣臺記〉中，自云其對浙東釣臺早已思得一遊為快，趁著「顧是役也，奉檄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遊也，然以為遊，則亦遊矣！」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五）》，卷19，頁44。

²⁷ 〔清〕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5，〈遊廬山記〉，頁15a；卷16，〈遊南岳記〉，頁1a-b。

²⁸ 〔清〕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6，〈遊林慮山記〉，頁25b。

²⁹ 〔清〕趙懷玉，《亦有生齋集文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道光元年刻本印行，1995），集部，別集類，冊1469，卷6，〈綿州李舍人登岱圖記〉，頁78。李和叔曾於乾隆59年(1784)，欽命冊封琉球副使，賜正一品麟服。歸國後，撰《使琉球記》6卷。事見〔清〕劉聲木，《長楚齋隨筆五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7，〈武官歿于琉球考證〉，頁1024-1026。

也有清代地方官主動邀請招待上官遊覽的例子，如乾隆朝的翰林庶吉士朱筠(1729-1781)在〈遊玉華洞記〉云，其於乾隆 45 年(1780)春典福建鄉試，有將樂縣知縣李延彩來謁試院，邀請他於行試汀州時順道遊玉華洞。³⁰

至於尚未作官的士人從事旅遊的例子，如《履園叢話》曾提到的康熙末年太倉州生員葉景高，號菊垞，「篤學好古，能文章，尤刻意於詩。喜遊覽，遍歷滇、黔、閩、廣。」³¹不過，清代士人的地位似乎不如明代遠甚，大概是因為科舉競爭較明代更加激烈，³²尚未入仕的士人無論是社會或經濟地位都不如明代的士人，所以想要從事旅遊活動，還是需要有力的贊助者，當然最好的贊助者就是官員。如安徽桐城派的創始人之一的劉大櫟(1698-1779)，一生很不得志，晚年為安徽黟縣教諭數年，後歸里。在他的〈遊晉祠記〉一文中，提到他所以能到太原一遊的原因：「是來也，余兄奉之官徐溝，余偶至其署，因得縱觀焉。」³³至於沒有贊助者或是贊助者有限的情況下，士人旅遊四方卻是件辛苦的事。

清代和明代較不同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幕友的旅遊活動。幕友在明代雖已出現，但人數不多，到清代中葉以後，士人充任幕友的情形頗為普遍，於是幕友的旅遊活動也自成一格。例如《履園叢話》的作者錢泳(1759-1844)，一生未至顯官，長期作幕客，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在《履園叢話》一書中就記載許多他遊歷之事，例如他遊天台山後，感到該山的一丘一壑，一溪一澗，風雲之出沒，花木之興衰，可以說是隨時變幻，移步換形，他形容這就好像讀過《史記》、《漢

³⁰ [清]朱筠，《笥河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椒華吟舫刻本影印，1995），集部，別集類，冊 1440，卷 7，〈遊玉華洞記〉，頁 16b。

³¹ [清]錢泳，《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叢話八·譚詩〉，「以詩存人」，頁 209-210。

³² 根據筆者的統計，明代鄉試舉人的錄取率從明初到中期以後（約在嘉靖年間以後），從 6%以上降到 4%以下，到了清代錄取率更低，幾乎只有 1%至 2%之間，可見競爭激烈。參見拙作，〈明清城市民變研究——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頁 194。

³³ [清]劉大櫟，《海峰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天津圖書館藏清刻本影印，1995），集部，別集類，冊 1427，卷 5，〈記·遊晉祠記〉，頁 32a。

書》的選本，不能算是真正讀過史書。他也體會到古人記載往往言過其實。³⁴在書中他還記錄了其他一些幕友的旅遊經歷，如江蘇丹徒人王文治，字禹卿，乾隆 25 年(1787)進士第三人，在其未及第時，曾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全魁的幕客，並隨之往琉球冊封，著有《海天遊草》。³⁵此外，乾嘉年間，常州著名的毘陵七子之一呂星垣，他所作之〈龍井遊記〉即記載其於乾隆 53 年(1788)，在鹽運使府下當幕客時遊歷的情景。³⁶浙江嘉興人李富孫(1761-1831)亦著有〈游東瀉堂記〉，記其於嘉慶 10 年(1805)作客婺郡二載，與幕友羅星寰、吳翊村同遊東瀉堂。³⁷蘇州吳縣人石韞玉(1756-1837)的〈采石磯游記〉，記其於乾隆 51 年(1786)作客和州時，與幕府諸君子遊歷著名的歷史古蹟采石磯。³⁸幕友的遊歷經驗常帶有田野調查的味道，錢泳就認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二者不可偏廢，然二者亦難兼得，遊歷不只是休閒而已，還要透過遊來了解「山川之形勢、道里之遠近、風俗之厚薄、物產之生植」等知識。所以他主張：「必讀書二十載，出遊二十載，著書二十載，方不愧『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者也。」³⁹

2. 旅遊相關書籍的出版

隨著旅遊風氣逐漸的恢復，旅遊相關書籍也陸續問世，如法式善(1753-1813)的《陶廬雜錄》記載許多叢書，其中就蒐羅了不少旅遊書籍，如《昭代叢書》中王士禛的《廣州遊覽小志》；吳震方《說鈴》叢書中陳鼎的《滇黔紀遊》、孔貞瑄《泰山紀勝》、吳闡思《匡廬記遊》、潘鼎珪《安南紀遊》、周清原《遊鴈蕩記》等等。⁴⁰另外，在清人的文集中也多蒐錄個別的遊記文，

³⁴ [清] 錢泳，《履園叢話》，〈叢話十八·古蹟〉，「天台山」，頁 487。

³⁵ [清] 錢泳，《履園叢話》，〈叢話六·書畫〉，「夢樓太守」，頁 151。

³⁶ [清] 呂星垣，〈龍井遊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五)》，卷 19，頁 11。

³⁷ [清] 李富孫，《校經廬文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刻本影印，1995)，集部，別集類，冊 1489，卷 16，〈游東瀉堂記〉，頁 10b。

³⁸ [清] 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寫刻獨學廬全稿印，1995)，集部，別集類，冊 1466，文卷 2，〈采石磯游記〉，頁 14a。

³⁹ [清] 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三·雜記上〉，「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頁 604-605。

⁴⁰ [清] 法式善，《陶廬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4，頁 129-131。

而且數量龐大。

這些涉及旅遊的相關書籍，其所具有的作用如同明代一樣，重新帶動了旅遊風氣的再興。有許多例子都足以說明，士大夫閱讀前人遊記後，受到遊記的影響而嚮往旅遊。如邵長蘅在〈魏叔子文集序〉一文中，提到他常想一登泰山，等到讀了《魏叔子文集》，作者述及登太華絕頂，親見日月從兩耳升降的景象之後，大嘆：「未嘗不栩然神往也！」。⁴¹又如潘耒在〈遊黃山記〉一文中，也說他十年前覽《黃山圖經》及諸名人遊記，久思一遊奇秀甲環的黃山而未果，後來遍遊東南各省諸山，與人談及各山勝景，人們往往稱黃山最為奇妙，使他更加嚮往。⁴²江西臨川人李紱(1673-1750)在〈六過廬山記〉一文云：「余年二十，讀桑喬所為《廬山記事》，愛之願得一遊，貧弗能也。」⁴³陳用光(1768-1835)在〈遊石門洞記〉一文中，憶及其少時讀朱仕琇〈遊石門洞記〉，而心慕其境，後果得一遊該地。⁴⁴桐城派大師姚鼐，在〈吳塘別墅記〉一文中，提到無錫汪銘常曾建別墅於吳塘之側，並有丹徒夢樓先生王文治為之銘；姚鼐描寫他讀完王文治詩後的感想：

獨念生平亦好樂山水，渡江至丹徒，止於夢樓之堂，自是以東，皆足迹未至。今讀夢樓之詩，景物奇勝，足繫夢想，尚思以異日東游，造錫山而窺吳塘之域，接汪君之容，而探其曠遠達觀之旨，斯誠生平之至願矣。⁴⁵

由此可見旅遊詩作常會觸動文人雅士的旅遊神經。

晚明流行像《新鐫海內奇觀》這類大部頭、圖文並茂的旅遊書，到了清代則較少見，取而代之的是個別的山川地理志的大量出版。這類書籍名稱通常買

⁴¹ [清]邵長蘅，《青門簾稿》，卷7，〈魏叔子文集序〉，頁18a。

⁴² [清]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5，〈遊黃山記〉，頁5a。

⁴³ [清]李紱，《穆堂初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道光十一年奉國堂刻本影印，1995），集部，別集類，冊1421-1422，卷29，〈六過廬山記〉，頁9a。

⁴⁴ [清]陳用光，《太乙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浙江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三年孝發堂刻本印，1995），集部，別集類，冊1493，卷4，〈遊石門洞記〉，頁28b。

⁴⁵ [清]姚鼐，《惜抱軒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84），卷14，〈吳塘別墅記〉，頁177。

以某某《圖經》或某某《志》，於是清代士大夫在旅遊時能作為參考的書籍也更多樣化了。明代士大夫在旅遊時攜帶這類書籍的例子尚不多見，到了清代，則是士大夫旅遊時常備的參考書。如王士禛在〈登燕子磯記〉一文中述及他遊南京時，「按《圖經》計道里」，依次遊覽城南、城北等風景勝地。⁴⁶又如方苞(1668-1749)〈記尋大龍湫瀑布〉文中記其旅遊該地之前一日入雁蕩，按《圖記》所載以求名蹟，「則蕪沒者十之七矣」。⁴⁷然而，這類書籍也不一定正確，就像潘未遊羅浮山時下榻小樓，閱讀《羅浮志》預選勝景以遊。他的摯友兼嚮導塵公則告訴他，說《志》書是不足為憑的，必須得里人熟悉徑路者任導遊乃可，⁴⁸因為隨著時間的變化，這些志書的記載與後來的演變總是有若干差距，或是原來就有錯誤。這類書籍除了作為旅遊導引資料外，其實還是清代士大夫在從事史地考證時重要的參考書，如錢大昕(1728-1804)在〈遊茅山記〉中，談到白雲崇福觀一節云：「巖阿環抱，據一山之勝，而游者罕至。有元趙世延所撰碑，楊剛中書，甚有法，而《茅山志》、《縣志》皆失載。」⁴⁹有關考證論述的部份，詳見第四節。

晚明以來，實景山水畫和旅遊的關係甚為密切，清代亦是如此。觀山水畫不但是欣賞畫，還是對旅遊慾望的一種彌補。如浙江人戚學標(1742-1825)在〈台山書圖記〉中說其年少時嘗有志於旅遊，遍觀家鄉山水，但終未遂其願，乃高價購「多藝而善遊」某僧人所作之畫。⁵⁰同樣的例子是喜好旅遊的龔煒，自云：

⁴⁶ [清]王士禛，《帶經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康熙五十年程哲七略書堂刻本影印，1995），集部，別集類，冊1415，卷42，〈魚洋文四·記〉，〈登燕子磯記〉，頁10a。

⁴⁷ [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收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咸豐元年戴鈞衡刊本印行，1989）（以下略編者），卷14，〈記尋大龍湫瀑布〉，頁210。

⁴⁸ [清]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3，〈遊羅浮記〉，頁2a-b。

⁴⁹ [清]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20，〈遊茅山記〉，頁337。

⁵⁰ 該僧不但自肆於山水間，「又圖其跡，測其高下，次其道途，所經小畫共一卷，……指山而問焉，指山之一草而問焉，皆有楷字注字處某水某坵某樹，無巨細，熟視之灼灼明矣。」戚學標得此畫後非常珍惜，事見[清]戚學標，《鶴泉文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五年刻本影印，1995），集部，別集類，冊1462，卷上，〈台山書圖記〉，頁47a-b。

「常思遍遊名山水，而阻於無事之忙，限於不足之力。今老矣，虛願難酬矣！披覽名人圖畫，恍若置身其中，亦可少補遊履所未至。」⁵¹有時會起更積極的作用，如有一則他提到之所以遊西湖，並書成《湖山記遊》的動機：

向觀《西湖圖》，心隨目注，途徑歷歷，不啻親遊其境。今春泛舟湖上，紅花繡堤，綠水浮山，倚棹哦詩，呼僮沽酒，又若身在圖中。往返半月，隨所得多少，書之成《湖山記遊》一卷，此二十年來出神入化之境也。⁵²

另外，晚明已出版的路程書到了清代又有更新的版本，如乾隆6年(1741)刊的陳舟士撰《天下路程》3卷，乾隆39年(1774)刊賴盛達撰《示我周行》，汪祺《天下水陸路程新編》與汪士鋐《欽定方輿路程考略》等書。這些書都有助於旅遊活動，而這些書的出版，也反映實際的需求與旅遊風氣的興起。

二、清代士大夫旅遊的實踐

以下透過清人的筆記與遊記，從各個方面來觀察士大夫實際的旅遊活動。除了筆記與遊記可以顯示當時士大夫的旅遊經驗之外，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末，一些西歐人到過中國，留下了關於中國印象的記載，正好可以作為評估當時中國旅遊文化發展的參考指標。如1696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國近事報道》，是法國傳教士李明(Louis Lecomte)來華期間，寫給國內要人的通信匯編。又如1792年，英國馬戛爾尼(George Lord Macartney)為首的使節團訪問中國，隨團來華的秘書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在返國後所寫的紀錄，細緻而深入地介紹沿途的所見所聞與感受。這兩本書都有不少關於中國旅遊文化的記載。

(一) 旅遊的地點選擇

在明代，江南地區是最著名的旅遊地點，明、清之際至清初期，雖然旅遊

⁵¹ [清]龔煒，《巢林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下，〈置身畫圖中〉，頁213。

⁵²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5，〈333湖山記遊〉，頁119。

風氣衰退，但是在大多數士大夫的心目中所嚮往者，江南仍是重要的旅遊勝地。如北平人韓昞，於亂後遊江南，遍歷台、宕諸勝，之後客死於平湖。⁵³同時，北人為避亂而選擇流寓江南者亦不少。⁵⁴

在晚明，士大夫對江南風景的印象非常深刻，甚至將旅遊所見的美景都以江南美景作比附。⁵⁵到盛清時期，隨著領土的擴張，形成許多新的旅遊景點，⁵⁶但是對清代士大夫而言，江南地區仍是士大夫的旅遊勝地，也仍然是士大夫在評比其他旅遊景點的「對照組」，如滿人鐵保(1752-1824)在〈遊北山砂河記〉中，暢言遊吉林砂河之勝景，足與江南山水媲美：「此時之樂，覺盤山、戒台，及江南之棲霞、靈巖，均不足比其清曠也。」⁵⁷可見即使不是江南出生的士大夫，也都有同樣的觀念，由此亦見江南山水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

至於江南著名的旅遊景點有那些呢？大致而言，就如同《揚州畫舫錄》云：「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亭勝；三者鼎峙，不可軒輊。」⁵⁸這段話指出江南集名山大澤、城市景點、園林亭苑等三大類旅遊地點於一身，江南不但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再加上士人群集，對美景的描述存留者特別多，可見江南「地以文名」，這種情況早在明代即已如此。⁵⁹

康熙《蘇州府志》云：「吳人好遊，以有遊地，有遊具，有遊友也。遊地

⁵³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11，〈談藝一·韓〉，頁257。

⁵⁴ 如《池北偶談》提到三原人孫枝蔚，因戰亂流寓江都。事見[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19，〈談藝九·孫豹人詩〉，頁464。

⁵⁵ 拙作，〈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收入熊月之與熊秉真主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頁232-233。

⁵⁶ 清代新形成的旅遊景點以帝王陵寢、皇家宮殿與園林最為突出，如沈陽故宮、關外三陵、承德避暑山莊與頤和園等。參見鄭淼，《中國旅遊發展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頁274-280。

⁵⁷ [清]鐵保，《惟清齋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道光二年石經堂刻本印行，1995），集部，別集類，冊1476，卷4，《梅安文鈔》，〈遊北山砂河記〉，頁9a。

⁵⁸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6，〈城北錄〉，頁151。

⁵⁹ 邵長蘅與友人遊江西廬山後，面對美景三疊泉卻歎道，若此潭位在吳會之區，那麼遊觀之士必定群集，名聲必定響亮。可惜是位置偏遠，遂不受注意。見[清]邵長蘅，《青門簾稿》，卷9，〈廬山遊記五小三級泉記〉，頁13b。

則山水園亭多於他郡。」⁶⁰江南名山大澤頗多，遊記中屬於這類遊山玩水的也佔大多數，在此不再贅述。清代江南的園林亭苑在數量上較明代更多，而園林向來是明清士大夫旅遊聚會之所。清代專以士大夫為客的園林，如前述邵長蘅所提到的東皋園，在明代一度是仕宦遊樂奢靡之地，清初因戰亂一度荒廢傾圮，迨十餘年後，有位「陶雲尊人靜山先生」稍加修葺而居之，遂以「東皋」名園。因為「主人雅好客，客益進，騷人墨士往往分韻角勝，觴詠嘯歌於其間。」⁶¹此園林再度轉變成文人雅士聚集之所。園林不但是旅遊的重要景點，也是一種招待所。如袁枚游仙都峰時，因為忘了時間來不及回旅店，見太陽將落，正欲覓處歇息，其從隸建議可到附近虞氏園小憩，袁枚遂如其言，而園主也熱情款待引入飲茗。⁶²

至於城市旅遊則一般遊記較少述及，但是從士大夫的筆記與日記中，透露出他們到城市所作的旅遊活動。如龔煒(1704-1769?)在《巢林筆談》書中描寫他到金陵的旅遊活動，「晝則閒步街衢，或小酌戲館，或詣友寓一談；夜則多少飲火酒，塌壁便臥。」⁶³他這種旅遊方式尚屬樸素，其實城市內不但有古蹟可供遊人賞覽，還有許多純粹供人「狹邪之遊」的消費服務業，就像《履園叢話》中就記載當盛清之時的江南士大夫們，「俱尚豪華，尤喜狹邪之遊」；在江寧的秦淮河上、在蘇州的虎丘山塘、在揚州的天寧門外之平山堂，都可見「畫船簫鼓，殆無虛日」，讓許多士大夫流連竟日。⁶⁴

(二) 交通工具與導遊

清代旅遊的交通工具，主要仍是肩輿轎子與遊船畫舫之類，在技術上與明代相比並無太大的突破，但是論及普及性與多元性則遠超過明代。

⁶⁰ [清]沈世奕，康熙《蘇州府志》（康熙三十三年序刊本，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卷21，〈風俗〉，頁14a。

⁶¹ [清]邵長蘅，《青門麓稿》，卷9，〈東皋園記〉，頁3b-4b。

⁶²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收入王英志校點，《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卷29，〈游仙都峰記〉，頁511。

⁶³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6，〈再遊金陵〉，頁158。

⁶⁴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七·臆論〉，「醉鄉」，頁193。

通常在一般陸路使用的是轎子或肩輿之類，名稱頗多，如籃輿、筍輿、兜子、山輿等等；這些泛稱為肩輿的工具大小不同，到了狹且陡的山路得靠更小的竹兜之類的交通工具。例如，梁章鉅於道光 28 年(1848)春遊鴈蕩山時，上山時因為路愈狹愈陡，同行者得各換坐竹兜緣溪而行；下山之後才由官路坐肩輿而歸。⁶⁵有些旅遊勝地是一般的交通工具所不易到達者，黃山就是著名的例子，葉燮曾比較黃山與廬山後指出兩者之差別：「以黃之險削，無步不仄，必前攀後援，方得僂僂進咫尺，廬則十之三可肩輿，故日少而事倍也。」⁶⁶當地土人用新的交通工具擔任舁夫的旅遊服務，如袁枚游黃山時因為山徑險惡，就算是乘兜籠也不行，而步行又太辛苦，幸好有土人用稱為「海馬」的工具背負客人，他遂由五、六位壯而佼者背負登山。他形容當乘「海馬」時，「捷若猱猿，衝突急走，千萬山亦學人奔，狀似潮涌」；但是，「俯視深坑、怪峰，在腳底相待。倘一失足，不堪置想。」⁶⁷

至於水路方面，在清初期旅遊風氣不盛，士大夫的遊記中往往顯示旅程中的不便，即使是要僱用交通工具亦非易事。如順康時人鄭日奎(順治 16 年[1659]進士)曾撰文提到在遊浙東釣臺時，見山景奇秀幽蒨，想僱舟一登，而舟子堅持不可行，只得送禮後乃肯載行，可見僱舟之不易。⁶⁸從遊記看來，清初士大夫對旅遊時的交通工具選擇性不多，對設備的要求也不高，如吳江人金之俊(1592-1670)的〈遊洞庭西山記〉提到他旅遊時偶然得乘一雙桅船，「遂乘而西，飽挂順帆，良驥無此疾，肩輿亦無此穩」，對此他已經很是滿意了。⁶⁹

到了清中葉旅遊風氣復興之後，城市近郊水路要道出現許多了載客的遊船待僱，在此就以蘇州與揚州二地為例。蘇州的旅遊勝地附近，每年有多次遊船畫舫聚集如雲，夜間則點燈而遊，稱為「燈舫」。在山塘燈舫群聚最重要的是

⁶⁵ [清]梁章鉅，〈遊鴈蕩日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五）》，卷 19，頁 48-49。

⁶⁶ [清]葉燮，《己畦文集》，收入俞子林等編，《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局，1994）（以下略編者），集部，冊 124，卷 6，〈追記黃山廬山兩遊〉，頁 7a。

⁶⁷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 29，〈游黃山記〉，頁 514-515。

⁶⁸ [清]鄭日奎，〈遊釣臺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五）》，卷 19，頁 45。

⁶⁹ [清]金之俊，〈遊洞庭西山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四）》，卷 16，頁 32。

元夕之燈節，其次是清明節；端午節則是群聚在南北濠一帶，觀龍舟競渡；再次為 6 月 24 日的荷花生日，游船群集於葑門外之黃天蕩，俗以其花盛，通稱「荷花蕩」；至中秋節時又舟聚於石湖之上，出入橋拱觀橋下月影，俗謂之「串月」；直到 10 月燈舫遊船之風才結束。⁷⁰揚州新城東北的便益門與廣儲門，因為臨近護城河，渡遊船皆集於此。⁷¹揚州的畫舫每年每月有特別的「市」或「會」，如春季有梅花、桃花二市，夏季為牡丹、芍藥、荷花三市，秋季為桂花、芙蓉二市，又正月有財神會市，三月清明市，五月龍船市，六月觀音香市，七月孟蘭市，九月重陽市。每當這些旅遊旺季時，遊人特別多，僱乘畫舫的費用也隨之水漲船高。⁷²這說明了隨著旅遊風氣的恢復和再興，有更多的人投入旅遊相關的交通服務業藉以維生，也提供了士大夫們旅遊時的服務。

到了清中葉，交通工具在設備上有相當程度的改善，士大夫對交通工具方面的要求也愈加重視其舒適性。如順天府人查禮(1716-1783)曾與友人欲同游海光寺，預先到城南濠僱三艘小舟，但是該地因積雨後始通篙楫，所以並無太多太好的舟船，所在的舟船在他的心目中都是「枯槎敗舫」，僅不過「聊具乘載而已！」⁷³又如袁枚的〈游武夷山記〉，形容他乘一小舟橫曳於武夷兩山間之夾溪而上，雖然溪河湍激，但在舟中乘客可坐或臥或偃仰，「惟意所適，而奇景盡獲」，可說是「洵游山者之最也」。⁷⁴又如查人漢在〈遊西湖記〉中特別強調他所坐遊船的舒適性，不但船內寬敞可容百斛，在船內箕踞半坐臥，四面不設窗障，在盛暑季節乘此船納水風特別涼快舒適。⁷⁵

法籍傳教士李明對中國官員從事旅遊時所坐的畫舫印象深刻，評價亦高。他說：「中國官吏的奢侈豪華特別突出表現在乘船旅行中。他們乘坐的船隻出

⁷⁰ [清]陳去病，《五石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 353-354。

⁷¹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 3，〈新城北錄（上）〉，頁 58-59。

⁷²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 10，〈虹橋錄上〉，頁 251。

⁷³ [清]查禮，《銅鼓書堂遺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查淳刻本影印，1995），集部，別集類，冊 1431，卷 29，〈中元冒雨游海光寺記〉，頁 1a。

⁷⁴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 29，〈游武夷山記〉，頁 521。

⁷⁵ [清]查人漢，〈遊西湖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五）》，卷 19，頁 3。

奇的大，可與軍艦的大小相媲美。清潔，雕樑畫棟，船艙裝飾的金碧輝煌，隨從官員和水手的數目眾多，他們高貴身份的各種標誌光芒四射，還有官品的徽飾、旗幟及彩旗。」他又特別強調中國人在這方面勝過歐洲：「這一切使得他們和從來在旅行時比平常更不在意、更不整齊的歐洲人形成天壤之別。」⁷⁶英國使節團秘書斯當東的回憶錄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對於中國遊船畫舫讚譽有加：

這種遊艇同英國和荷蘭運河上的遊艇差不多。不過它是為比較遠程航行設計的，因此比英荷遊艇更大，裝備得更齊全，裝飾得更好。特使佔有的房間包括寢室、套間、會客室、廁所，差不多整個遊艇專供他一個人使用。……船尾有一小房間供水手居住，屋角擺著一個供奉偶像的祭壇，……。另有隨行小船，專門裝載飲食物品及廚師，準備特使用餐。這樣，船隻就可以在順風順水的時候一直往前航，不必為吃飯而上岸耽誤時間了。⁷⁷

至於對中國人旅遊乘坐的轎子，並沒有太多的評論，反而是他們從英國帶來的馬車令中國官員驚豔，其云：「特使有時約幾位同行的中國官員進到車來同坐一起。中國官員最初怕車身太高，容易傾覆，特使告訴他們絕對安全。他們坐在車上，看到各種靈巧設計，嘗試到舒服的彈簧座位，可以隨意開關的玻璃和百葉窗，車子走得又穩又快，他們樂不可支。」⁷⁸

其次，士大夫在旅遊時需要有嚮導，如果是城市附近的旅遊景點，有同儕好友作為導遊即可。⁷⁹但若是到路程遠、範圍廣的景點，則需要當地人任導遊。

⁷⁶ [法] 李明(Louis Lecomte)著，郭強、龍雲、李偉譯，《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河南：大象出版社，2004)，頁154。

⁷⁷ [英] 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香港：三聯書店，1994)，頁222-223。又說：「在符合旅客舒適的條件下，遊艇的構造盡量使其輕便。旅客住在甲板上的房艙，它的上面再沒有住人的房間，它的下面也沒有很大地方裝行李。」(頁364)感謝陳正國教授提供此資料。這段關於畫舫的記載是英使團由白河往北京時所記的，他們後來離開京城由大運河到杭州以及滯留杭州時，也有稱讚中國遊船的記載，見頁364、398。

⁷⁸ [英] 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259。

⁷⁹ 如梁章鉅回憶他遊西湖一事云：「此番出門以游西湖為主名，既小住武林，得許苟友連日導游，游事亦頗暢，此平生第一勝踐」，所以特地寫了一首〈西湖紀遊詩〉。事見〔清〕梁章鉅，《浪

從晚明的遊記來看，當時尚未能肯定有專業的導遊出現，而是由一些人「兼差」充當；清代則出現較為專業的導遊，這些人包括了里保或童子。如袁枚游廬山途中遇雨時，引路的里保自己避雨遠竄，雖大聲呼叫卻杳無應者。⁸⁰又如趙懷玉遊兩尖山時，有裴姓童子為嚮導，才能克服登徑的絕險。⁸¹抬轎子或肩輿的舁夫也是很好的導遊，比如呂星垣於乾隆 53 年(1788)欲遊杭州，五更時聞湖寺鐘聲，所僱之三健足舁筍輿載他遊覽其他同僚所未至之地，所以他歎道：「然茲遊也，余所獨也！余亦賴健足三、杖一、草履二，雨遂使葉道以下，日色未晚，乃遊黃雲洞歸，歸而歎秦觀之記未盡也。」⁸²

和明代一樣，僧道這類方外人士，常是士大夫旅遊的導遊，這類例子頗多。⁸³名山勝景中多有寺院，僧道會成為士大夫訪求的對象，主要原因就是為了問路與探路，像潘耒遊南燕蕩山時，向寺僧詢問山中諸名勝，則皆云路封閉，且經一二百年，悉不知所在，只有仙姑洞可一遊，於是由行僧徹菴為嚮導，備裹糧覓肩輿而行。⁸⁴對士大夫來說，僧道因為不求利，所以比較誠實可信，如方苞〈記尋大龍楸瀑布〉就記載，當他按書求名蹟時，蕪沒者十之七矣，於是一方面訪於眾僧，一方面僱肩輿前往，途中因為蔓草被徑，輿者騙稱此地危險至極，於是他們只好悵然而返；正好老僧在門口見狀問故，笑稱已近目的地，不過咫尺之間，遂為諸人作嚮導，方苞才終於到達預定要遊覽的地方。於是他歎道：「苟有識道者，為之先，實近且易也。孔孟程朱，皆困於眾廝輿，而時君不瘥，且不可惜哉？」⁸⁵再者，小和尚又不如老和尚有經驗，像是邵長蘅〈廬山遊記四三疊泉記〉一文記載，他旅遊時由雛僧導行五里後，返時遇老僧元公，元公詢問遊狀後笑稱，該地名勝外龍潭不過尚有五里而已，不應半途而廢。邵長蘅

跡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1，〈西湖紀遊詩〉，頁2。

80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29，〈游廬山黃埕遇雨記〉，頁516。

81 [清]趙懷玉，《亦有生齋集文卷》，卷6，〈遊兩尖山記〉，頁6b。

82 [清]呂星垣，〈龍井遊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五）》，卷19，頁11-13。

83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29，〈游桂林諸山記〉，頁519。

84 [清]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4，〈遊南燕蕩山記〉，頁2。

85 [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4，〈記尋大龍楸瀑布〉，頁210。

乃又賈勇復往，遊後得意地說這次之遊是古人李白等諸君皆未及觀，卻又歎道若非途中巧遇老和尚，否則驟信小僧人所言，此行當不可能盡興。⁸⁶

（三）旅遊食宿的發展

清代士大夫在旅遊的飲食方面和明人相類似，在遊記中常見他們描寫如何「裹糧以往」，「買舟載酒」，「挈酒榼，攜饌具」等形容。⁸⁷若是高官的宦遊行程，不但有「從者進所攜酒，滿引數扈而行」，而且又有地方官與高僧陪同。⁸⁸清代比起明代更進一步發展的是，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出現旅遊業與飲食業合而為一的情形，如《畫舫餘譚》記載金陵城內許多過去頗富盛名的酒樓，包括泰源、德源、太和、來儀等，而新聞名者則有在利涉橋附近的便意館及淮清橋河沿岸之新順館。新順館乃蘇州人所開，特色是盤饌極為豐腴。但論酒菜之味則是便意館為最，其招牌菜有扣肉、徽圓、荷包蛋、鹹魚、悶肉、煮麵筋、螺羹等等。這些酒樓從早到晚可說是坐無虛席，而且遊賞的畫舫也都匯集於此酒樓外，要求外帶餐點，所謂：「某船某人、需某菜若干酒若干碟若干，萬聲齊沸，應接不暇。」⁸⁹如此一來，畫舫的休閒旅遊消費和酒樓的飲食消費結合，提供了遊客更周全、更方便的服務。同書又提到當地富人縉紳招待外來客人，必定請之乘坐畫舫旅遊，而且還準備許多旅遊的飲食，當地稱之為「火食船」：

凡有特客或他省之來吾郡者，必招遊畫舫以將敬，……另以小舟載僕輩於後，以備裝煙問話，盤餐或從家庖治成，用硃紅油盒子擔至馬頭，伺船過送上；或擇名館，如便意、新順之類，代辦以取其便；又或僱僮外間庖人，載以七板兒一兩隻，謂之「火食船」。⁹⁰

⁸⁶ [清]邵長蘅，《青門簾稿》，卷9，〈廬山遊記四三疊泉記〉，頁12a-13a。

⁸⁷ [清]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4，〈遊南雁蕩山記〉，頁2a-b；[清]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據吳興嘉業堂對承幹刻本印行，1985），〈濠上後遊記〉，頁220；[清]李富孫，《校經廩文稿》，卷16，〈游東瀟堂記〉，頁10b。

⁸⁸ [清]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3，〈遊羅浮記〉，頁5a-b。

⁸⁹ [清]捧花生，《畫舫餘譚》，收入[清]王韜輯，《艷史叢鈔》（台北：廣文書局據嘉慶二十三年刊本印行，1976），頁311。

⁹⁰ [清]捧花生，《畫舫餘譚》，收入[清]王韜輯，《艷史叢鈔》，頁324-325。

由上引文可知，清代旅遊、尤其是在城市旅遊時，對飲食的舒適性非常注重。我們還可以看到在清代的旅遊業中，出現遊船的經營與飲食、聲色娛樂結合的情形，最著名的就是浙東的「江山船」。許奉恩《里乘》云浙東的江山船，內部陳設華而潔，飲饌精且新，船各蓄有年少美姬二三人，大抵以桐廬、嚴州人居多，有船家親生或購養者，兒時即延師教度曲弦管等技，「凡仕宦客商登舟，飲食起居，皆若曹伺奉，無須廝僕。」⁹¹

至於旅遊時的住宿方面，一般士大夫在旅遊時常住宿的是旅店與寺觀。清代供歇息住宿的旅舍或旅店，似乎較明代更為普及。從清代的小說如《子不語》與《閱微草堂筆記》等中，可以看到許多發生在旅店或旅舍的鬼怪故事。在清人遊記中提及旅舍的記載也較明代更多，如吳江人葉燮(1627-1703)在遊黃山與廬山後的遊記，描述他旅遊二山時都是住在旅舍中，而非僧寺道觀之類。其中一次得大病於旅舍，幾乎將亡；另一次抵旅舍後遇到火災。⁹²又如袁枚與錢大昕都曾在他們的遊記中分別提到住宿旅店的情形。⁹³

在江南一些經濟繁榮的風景名勝地區，還出現建築相當講究的高級旅舍，稱之為「亭」，《揚州畫舫錄》中記載這些亭的形制與內部陳設：「重屋無梯，簷檻四植，如溪亭、河亭、山亭、石亭之屬。其式備四方、六八角、十字脊，及方勝圓頂諸式。亭制以金鼇《退食筆記》九梁十八柱為天下第一。」⁹⁴在湖上這類的亭特別多，當時可都是號稱為最華麗的高級飯店。清代商人和明代一樣，都會在重要的景點，設立湖樓之類的建築，供遊客住宿賞景。例如，浙江海寧人查人漢在〈遊西湖記〉曾描寫道光 13 年(1833)間，他與友人同寓「萬峰齋湖樓」時，親見浪來時屋內會動搖，而湖船可直抵門口，水與岸幾乎平行，只隔一檻之高。⁹⁵

⁹¹ [清]許奉恩，《里乘》（四川：重慶出版社，2000），卷3，〈袁姬〉，頁62；[清]宣鼎，《夜雨秋燈錄》（濟南：齊魯書社，2004），卷3，〈珠江花舫〉，頁147。

⁹² [清]葉燮，《己畦文集》，卷6，〈追記黃山廬山兩遊〉，頁8a。

⁹³ [清]錢大昕，《潛研堂集》，卷20，〈遊茅山記〉，頁335。

⁹⁴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17，〈工段營造錄〉，頁420。

⁹⁵ [清]查人漢，〈遊西湖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五）》，卷19，頁1。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少見宦遊時有特別住宿處的記載，而清代地方衙署都有特別建置供招待旅遊或巡視的官員住宿。如梁章鉅於道光 28 年(1848)遊瀟蕩山，先行至福建樂清縣時有友人迎接他，並招待他進入規模宏敞的縣廨住宿休息。據聞凡是學政過境，或是歷來閩、浙駐防的都統視兵至此，皆會下榻其中，而知縣的眷屬則僅起居於東偏。⁹⁶這類招待所有時又稱為「行館」，如洪亮吉(1746-1809)在〈遊廬山記〉中，記載他從官道至南康府 15 里，有星子縣令周吉士遣人遠迎，並入城在一間「行館」休憩。⁹⁷這種建置的出現，可能和清代官場盛行招待旅遊的風氣有關。此外，清代的富貴人家為招待遊人，會建立所謂的「賓館」，如《履園叢話》中云：

今富貴家亦有賓館，有客座，原所以待客者也。或主人他出，或實在無暇，或適有公事，或偶攪疾病，亦可使主賓之友相陪，問因何事而來，有所言否。若拒之，必生眾怨，眾怨一生，便多浮言，殊非處世保家之道。豈富貴家反不如釋道耶？⁹⁸

從上引文中可見，當時富貴家非常注重待客之道，以免遭人怨言與非議。這種「賓館」是明代所未見的。

對上述這類高級旅店與官員招待所的「亭館」，清代士大夫的遊記中也曾給予某些亭館相當高的評價，如袁枚的〈游端州寶月台記〉特別指出寶月台此地之優越性與舒適性：「亭館之宜，避寒易，避暑難。……余雖好游，得此于他處者甚寡。且喜離府署近，常攜筆硯，避暑其間。」所以文後他自鳴得意的是，自從他遊歷之後，此台聲名大噪，四方官員士大夫皆慕聞風而來遊。⁹⁹不過，這種高級的旅遊住宿設施，恐怕仍只是少數，就像英使團秘書斯當東很肯定中國旅館的普及性：「中國公路旁邊，客店非常之多」¹⁰⁰，但是論起設備恐

⁹⁶ [清]梁章鉅，〈遊瀟蕩日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五）》，卷 19，頁 46-47。

⁹⁷ [清]洪亮吉，《更生齋文乙集》（台北：華文書局據清光緒三年授經堂重刊本印行，1969），卷 3，〈遊廬山記〉，頁 8a-b。

⁹⁸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七·臆論〉，「拒客」，頁 191。

⁹⁹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 29，〈游端州寶月台記〉，頁 520。

¹⁰⁰ [英]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 414。

怕遠不及英國的鄉村旅店，他對北京附近旅店的印象是：「一行人等路過一個村莊，停下來小憩進早餐，他們停在一個小客店裡，同英國的現代化的村莊小店不能比擬。客店不算華麗，沒有裝飾，但收拾的還很乾淨，也相當涼爽。」¹⁰¹

旅遊活動雖然從晚明以後就已經非常商業化，許多風景點的相關旅遊設備也算相當普及，但是僧院仍是接待遊客的重要場所。如洪亮吉(1746-1809)在〈遊天台山記〉一文中，描寫他旅遊時住宿清涼寺、方廣寺、桐柏宮與國清寺多日，且稱此為「方外之勝遊」。¹⁰²雖說釋道寺院向來就有供寄宿的「客堂」與接待客人的「主客師」制度，「使四方遊人，善男信女，咸可小憩，有來禮佛者，有來布施者，從無拒客之禮。」¹⁰³但是與一般大眾在特定的日子才會進香投宿的情形不同，士大夫特別偏好旅遊時到釋道寺院投宿，尤其是在偏遠的風景區仍依賴佛道僧院提供食宿。就如同潘耒在〈遊羅浮記〉一文中，其友提到羅浮山並非難遊之地，只是苦無棲息之處，該地附近有名刹華首臺可安宿，且必得與主僧塵異偕行乃可暢遊。據說這位和尚「學通內外」，潘耒與之相見甚喜，載與同行。¹⁰⁴清代士大夫與明朝一樣，與高僧的交往密切，從上述潘耒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士大夫與高僧惺惺相惜的感覺。而釋道寺院對士大夫也是特別禮遇，若有名宦或名士造訪，還可見到「僧數輩出迎」的場面，這也更加驗證儒釋之間的密切關係。¹⁰⁵

(四) 遊友與遊具

明代士人結社的旅遊活動到了清代雖然逐漸沈寂，但是結伴而遊的情形很普遍，就像袁枚所說的旅遊之樂的三大要件：「佳節也，勝境也，四方之名流

¹⁰¹ [英] 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 268。

¹⁰² [清] 洪亮吉，《更生齋文乙集》卷 3，〈遊天台山記〉，頁 5b；又如姚鼐的例子，參見 [清] 姚鼐，《惜抱軒全集》，卷 14，〈金焦同遊圖記〉，頁 174。

¹⁰³ [清] 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七·臆論〉，「拒客」，頁 191。

¹⁰⁴ [清]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 13，〈遊羅浮記〉，頁 1a-b。

¹⁰⁵ 如趙懷玉(1747-1823)，江蘇常州府陽湖縣人，乾隆 45 年舉人，授內閣中書。懷玉於乾嘉中有文名，在〈遊西山記〉文中記載其於乾隆 49 年(1784)與友人遊北京西山之勝，抵戒壇寺時，有「僧數輩出迎」。見 [清] 趙懷玉，《亦有生齋集文卷》，卷 6，頁 8a。

也」，但要同時具有此三者，並非偶然可得也。若能偶然得之，更是一大樂也。¹⁰⁶尤其是官員之間約訂日期同遊的例子俯拾即是，在許多遊記中，常載有同遊的官員職銜與名稱，就以姚鼐的經歷為例，他在乾隆 39 年(1774)12 月自京師遊登泰山時，是與知府朱子穎同由南麓登山。乾隆 42、43 年間(1777-1778)，他又和兩位官員同遊金焦二山，還留有圖作紀念。¹⁰⁷

其他情況還可以看到與親家同遊者，如梁章鉅曾與親家楊竹圃買舟逕為東淘之游，復拏舟同游海陵訪友。¹⁰⁸又有與同年共遊的例子，如趙懷玉於乾隆 49 年(1784)春寓居京師城東之白衣精舍，邀與同年生言起霞、朱屏之同遊西山之勝。¹⁰⁹士大夫通常會帶著自己的兒子同遊，趁機讓孩子見見世面，對兒子未來的舉業不無幫助，如梁章鉅在遊浩然樓時，同行者除了兩位知府以外，還有他的兒子。¹¹⁰再如蘇州府長州縣人汪琬(1624-1690)的〈游馬駕山記〉，也記其同遊者除了友人、門人之外，還有其長子汪筠。¹¹¹這樣旅遊兼教育與社交的功能，部份類似十八世紀英國的「大旅遊」(Grand Tour)。當時英格蘭的上流子弟，在教育方面有一個重要的階段，即所謂的「大旅遊」。他們一般會到歐洲大陸遊學三、五年，學習歐洲的語言，見習優雅的禮儀、培養藝術品味與結交上流社會的人物等。明清士大夫旅遊時常帶著子弟也具有類似的功能，但並未像英格蘭形成一種紳士教育的傳統。

清代的士大夫在旅遊時也和明代士大夫一樣，都會帶著一些僕人隨從，少有隻身出遊者。當主人難於行時，這些僕人就發揮極大的作用，如查人漢於道光 13 年(1833)夏，與友人鮑朗如登葛嶺，尚未及山巔，因鮑朗如體胖，雖勇於登卻苦不能上，遂命二僕人扶掖而行。¹¹²有時旅遊時的僕從眾多，還引人側

¹⁰⁶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 12，〈戊子中秋遊記〉，頁 211。

¹⁰⁷ [清]姚鼐，《惜抱軒全集》，卷 14，〈登泰山記〉，頁 169；〈金焦同遊圖記〉，頁 174。

¹⁰⁸ [清]梁章鉅，《浪跡叢談》，卷 2，〈下河舟中雜詩〉，頁 28-29。

¹⁰⁹ [清]趙懷玉，《亦有生齋集文卷》，卷 6，〈遊西山記〉，頁 8a。

¹¹⁰ [清]梁章鉅，《浪跡叢談·續談》，卷 2，〈浩然樓〉，頁 271。

¹¹¹ [清]汪琬，〈游馬駕山記〉，收入 [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清光緒三年至十三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冊 30，頁 126a。

¹¹² [清]查人漢，〈遊西湖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五）》，卷 19，頁 1-2。其

目，如徐乾學的〈遊普陀峰記〉中，提到他們到達近縣城的某地，因為該地遊人罕至，而他們的隨行僮從甚眾，引起村童婦女簇立環視。¹¹³

康熙《蘇州府志》稱江南旅遊文化中所重視的「遊友」，乃所謂清客也，「工爲聲伎，富室朱門，相引而入，花晨月夕，競爲勝會，聽者爲之移情。」清代的士大夫其實和明代一樣，在旅遊時也可以看到他們帶著妾室或妓女。江南城市的青樓文化，在明清之際因爲戰爭的關係一度蕭條衰敗，至清中葉後，和旅遊風氣一樣逐漸地恢復往日的盛況。關於清代士大夫「挾姬」旅遊的敘述，在筆記史料中有較完整與清楚的記載，如《柳南隨筆》就記載孫艾之事，據云其人「嘗遊金陵，狎客慾攜謝妓」，他就遍訪教坊季女，共得 7 人，甚至還花費 2 萬金爲其女舉辦奢華的婚禮，人們還稱他「豪邁如此」。¹¹⁴士大夫在旅遊時攜妓嬉遊的情況，又見於《秦淮畫舫錄》中所提到的名妓楊枝的故事，據作者捧花生的回憶，當時有某位翰林官深爲激賞，還邀作者僱畫舫，「挾姬爲水嬉」。¹¹⁵所以上文提到錢泳形容江南的士大夫「喜狹邪之遊」，所言並不虛矣。然而，清代士大夫挾妓旅遊一事，在清人文集的遊記文中並不明顯，甚至不曾有過蛛絲馬跡，這和晚明士大夫在遊記中大談與「姬」嬉遊的情況大異其趣。爲何明清的遊記文本在書寫上會有如此大的差異是頗值得注意的問題。這種文本上所呈現出的歧異現象，正說明了清代的文化氣氛已經不再像晚明一樣，大肆宣揚所謂的「心性解放」，所以即使清代的士大夫在旅遊活動方面其實已經恢復如同明代，但是卻不敢在遊記中明目張膽地大談娛樂性。¹¹⁶

再者，士大夫在旅遊時需要所謂的「遊具」或「濟勝之具」，在清人的遊

他例子，參見〔清〕洪亮吉，《更生齋文乙集》，卷 1，〈遊幕府山十二洞及泛舟江口記〉，頁 10b。

¹¹³ 〔清〕徐乾學，《儵園文集》，卷 25，〈遊普陀峰記〉，頁 22b。

¹¹⁴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 6，頁 115。

¹¹⁵ 〔清〕捧花生，《秦淮畫舫錄》，收入〔清〕王韜輯，《艷史叢鈔》，頁 281。

¹¹⁶ 明清兩代的法令中，都有明訂不准士大夫挾妓宿娼的規定，否則將受重罰（參見明清律令中的〈刑律·犯姦〉，「官吏宿倡」條），所以法令並不是影響明清兩代士大夫行爲差異的重要原因。

記中，常見士大夫因缺乏遊具或遊具未備齊而中途折返的事例，¹¹⁷由此可見遊具的重要性。法籍傳教士李明已經注意到中國人喜歡旅遊，而且還特別注重功能齊全的「遊具」。如他介紹中國人日常衣著之外，還特別指出有兩類衣著值得了解，其中一類就是防雨的雨衣。至於為什麼中國特別重視防水的雨衣呢？他說：「因為中國人極好旅行，所以不遺餘力的使旅行變得舒適方便。」¹¹⁸

明清以來，士大夫所稱的遊具指的是旅遊時攜帶的器具以及旅遊用的交通工具，但是就像康熙《蘇州府志》所云：「遊具則名酒嘉餚，畫船蕭鼓，咄嗟而辦」，可見士大夫更重視的是享樂的、舒適的名酒嘉餚與畫船蕭鼓。清代士大夫在旅遊時帶著許多器具，其中的飲食品並不只是樸素的一般用品，如方象瑛與一群士大夫在嘉興府名勝鴛鴦湖旅遊時，不但僱遊船，還帶著酒榼器具同遊，這類旅遊時「以酒肴從」的例子還不少。¹¹⁹此外，士大夫們還會攜帶一些飲酒作樂的器具，就像錢泳描寫他於嘉慶元年(1796)8月和幕友諸君同遊西湖時，攜帶著古琴、茶具，到夜半二更餘，萬籟寂然，月明如畫，又命操舟的篙師烹茶，作者自己則撫琴作數弄，眾人群歡而飲。¹²⁰洪亮吉遊幕府山十二洞時，晚間與數友人載酒涉險，並舟浮江，一邊遊玩賞景，一邊攜樂器較量，所謂：「小史羌笛，長年吳歌，矢晨露之詞，衣夜行之錦，樂且無極」，「蓋較量絲竹，所以陶寫性情。」¹²¹可見他們出遊時如同明代士大夫一樣，不但有僕人隨從，而且還帶了樂器與美酒，一同與友人旅遊作樂，還極力稱道這種旅遊的娛樂性。¹²²

¹¹⁷ 就像潘耒遊洞庭湖時，到了林屋洞，「雨洞門如覆甑，不屬地者尺許，窺之窅黑沮洳在中，以未備遊具，姑舍去。」見〔清〕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4，〈遊西洞庭湖記〉，頁21a。

¹¹⁸ 〔法〕李明(Louis Lecomte)著，郭強、龍雲、李偉譯，〈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頁141。

¹¹⁹ 〔清〕方象瑛，〈遊鴛鴦湖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五)〉，卷19，頁15。又見於〔清〕查人漢，〈遊西湖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五)〉，頁10。

¹²⁰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四·雜記下〉，「琴心曲」，頁644。

¹²¹ 〔清〕洪亮吉，〈遊幕府山泛舟江口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四)〉，卷16，頁3-4。

¹²² 這種情形不限於江南地區，常州陽湖人惲敬(1757-1817)在〈同遊海幢寺記〉一文中，述及廣州地區旅遊勝地海幢寺，向為粵東諸君子吟賞旅遊之地，「南村麥學博鼓大琴，為關雎賽上，鴻之操鳳石，鐘孝廉以樂書吹笛，定其弦」，一幅士大夫們樂在其中的情景。見〔清〕惲敬，

（五）小結：商品化、娛樂性與舒適性的恢復

晚明以來旅遊風氣的興盛，明顯地看到旅遊消費所呈現的商品化現象。雖然明清之際因天災人禍，旅遊亦沉寂一時，迨清中葉士大夫的旅遊風氣又再度復興。從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中，我們可以看到旅遊消費的商品化現象較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在城市旅遊活動中出現旅遊業和飲食業結合的現象；在旅遊住宿方面，旅館與旅舍較明代更加普及，而且出現更精緻化的亭、湖樓等設施；僱用的交通工具也愈加普及與多元化，而且呈現由簡樸到華麗，在價格方面也會隨市場而波動，不過在許多技術層面並沒有革命性的突破。

至於當時中國旅遊的硬體設備發展的程度，我們可以當時來華西人的紀錄來作評估，尤其是十八世紀歐洲旅遊文化最先進的英國人來到中國後所作的評論，比起十七世紀末法國傳教士的印象更加深刻，在作為中西旅遊文化的比較上更具代表性。我們可以看到英使團秘書斯當東在評價中國旅遊相關設施時，也都是從比較的角度出發。透過他的紀實，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當時在旅遊的交通工具方面，水運的設備優於西方，但在路運方面則顯然落後；而在旅遊住宿方面，雖然旅館已經相當普及，但是設備尚不如英國農村小旅店。

此外，明代士大夫旅遊文化中的娛樂性，在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中亦可看見，如攜妓旅遊，帶僕人隨從飲酒作樂等行徑。至於晚明士大夫旅遊時所重視的舒適性，從清代士大夫旅遊活動中的交通、住宿與飲食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由此可見，到了盛清時期隨著經濟的繁榮、物質條件的豐厚，足以促使士大夫又重新回到像晚明一樣講究娛樂性與舒適性的旅遊。然而，清代士大夫在遊記的書寫方面，卻出現與明人遊記截然不同的轉變。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卷3，〈同遊海幢寺記〉，頁34a。

四、清代士大夫遊記書寫的轉變

（一）雅俗與品味論述的淡化

晚明的遊記顯示有不少士大夫，特別多是中、下層的士人們會把旅遊和身分連繫起來，藉「雅／俗」的對立來區分他們的旅遊文化與眾不同。清代的士大夫遊記也可以看到注重旅遊文化中雅俗之別者，痛恨大眾旅遊時眾聲嘈雜，將美景名勝變成庸俗之地，如湯傳楹在〈遊虎丘記〉中提到：

予顧而言，茲山苦俗久矣！芳春之朝，清秋之夜，圍珠捧翠，載酒徵歌，犬吠驢鳴，間不容膝，此輩俗物敗意，予曾有禰生尸冢之歎。今日青山主人，呼舒青眼，幸無惡客，汙我洞門，此間一片石，差許吾輩借生公塵尾一揮，為山靈解穢，良云勝事。¹²³

他同明代士大夫一樣，都認為蘇州著名的風景區虎丘，因為遊客太多，成了殺風景之事，正所謂「此輩俗物敗意」。再如方苞〈再至浮山記〉描寫他的友人對該地的評語：「茲山之勝，吾身所歷，殆為有也。然有患焉，方春時，士女雜至，吾常閉特室，外鍵以避之。夫山而名，尚為遊者所敗壞若此。」¹²⁴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看到，清代士大夫如明代士大夫一樣，也會刻意選擇遊人較稀的旅遊景點，如施閏章〈碧泉記〉中描寫他到湖州三日，詢問知縣吳公該地山水之最，吳公首舉碧岩，原因是：「碧岩故弁山高處，太守嘗與客遊憩其上，而湖之人罕至焉。」¹²⁵另一位石韞玉比較香泉與驪山溫泉之後的評價，也反映了相同的觀點：

天下之溫泉不勝計，最著者驪山也。然驪山當西北往來之衝，輪蹄絡繹，擔夫郵卒雜沓乎其間，豈若此泉僻處江濱，譁囂所不至，以葆其

¹²³ [清]湯傳楹，〈遊虎丘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四）》，卷16，頁26-27。

¹²⁴ [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4，〈再至浮山記〉，頁209。

¹²⁵ [清]施閏章，〈施愚山先生學愚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2），卷14，〈碧泉記〉，頁290-291。

天此之晦，未必不幸於驪山之顯。¹²⁶

呂星垣〈龍井遊記〉中提到他經健足的帶領下，遊覽了一般遊人所到不了的杭州西湖附近的名勝，遂得意地說道：「杭人十萬戶，類各閉戶偃息，熟攜屐至湖上，遠而尋幽，西極龍井。」¹²⁷

清代士大夫延續明代士大夫故作異態的行為，以吸引眾人之眼光，並展示他們與眾不同的風格或品味。最具代表的是邵長蘅，他自號青門山人，喜好旅遊，尤愛杭州的湖光山色，數度往遊。在〈廬山遊記——青玉峽記〉中描寫他強迫友人周生三更半夜陪他在深山竹林中漫步聽瀑聲，周生心悸欲還，他則大呼曰：「天壤間自有此峽以來，乘月坐石聽瀑如吾兩人者，亦不多得。」¹²⁸邵長蘅並不是孤例，類似他這樣行徑的士大夫大有人在，如李紱〈遊底園記〉就描繪：「相與攜樽壘，負深林，席地豪飲，譁笑動林木，崖下估舟往來者，咸瞪目瞠視而過」，可見他特立獨行的旅遊行徑吸引了眾人的目光。¹²⁹

晚明有一些著名的文士發展出了一套「遊具」的論點，甚至還有士大夫自創新的旅遊工具，來表現自己的品味。在這方面，邵長蘅的表現也與晚明士人相類似，他在〈毛會侯垂竿圖記〉一文中就自稱：「當治一舫，浮家泛宅，徜徉兩湖，以彷彿圖之所為垂竿者，亦足慰矣。」¹³⁰這和明代士大夫喜歡自營畫舫遊船的習性如出一轍。也有士大夫和邵長蘅有類似的想法，如王昶在〈遊龍泉記〉一文中，就提到他想要在旅遊勝地築上獨具風味的小屋：「為屋三楹，縮以版下，可掉小舟通也，屋之右為橋，宛轉以屬，於池中之亭，登亭以望，則人煙之杳靄，山嵐之層疊，可覽而盡也。」¹³¹另外還有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揚

¹²⁶ [清]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文卷2，〈香泉游記〉，頁13。

¹²⁷ [清]呂星垣，《龍井遊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五）》，卷19，頁13。

¹²⁸ [清]邵長蘅，《青門叢稿》，卷9，〈廬山遊記——青玉峽記〉，頁10a-10b。

¹²⁹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16，〈遊底園記〉，頁12a。

¹³⁰ [清]邵長蘅，《青門叢稿》，卷4，〈毛會侯垂竿圖記〉，頁6a。話雖如此，邵長蘅的願望其實並未達到，他雖然買了一舟，但因為接下來數年間，他「奔走衣食」於各地，並無暇經營其理想的畫舫，而「舟亦敝漏棄去」。

¹³¹ [清]王昶，《春融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嘉慶12年塾南書舍刻本，1995），集部，別集類，冊1437，卷49，〈遊龍泉記〉，頁6a。

州畫舫錄》所提到的江增。江增，字兆年，號臞生，性好山水，於黃山下構「臥雲庵」自居。他是著名的揚州鹽商江春之後代，揚州江氏一族繁衍很盛。江增自製了一種遊具，稱之為「游山具」。這個游山具是個類似扁擔，兩頭各吊著三層櫃子的器具。江鄭堂曾為之作〈游山具記〉，據云他每一出游，「湖上人皆知為臞生居士來也。」¹³²

看來明代士大夫的旅遊文化，的確在清代仍有相當程度的延續，在清代的遊記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士大夫和晚明一樣注重旅遊的雅俗區分，像是有意地選擇一般遊人不出遊的時節，或是到遊人罕至的景點，會故意作態來吸引眾人目光，也會像晚明士人一樣自創有品味的精緻遊具。然而，細加比較後會發現，清代士大夫的遊記有幾個重大的差異。第一，在清代，介紹精緻化遊具的這類書籍不再有新版本的出現。晚明士人在塑造精緻化的遊具方面，有許多理論性的專著出版，如《長物志》、《遊具雅編》與《遵生八箋》等書。然而在清代卻不再出現此類書籍，也就是說過去指導塑造具有品味的遊具的著作，似乎已不是士大夫文化的主流。

再者，在晚明的一些遊記中，可以看到特別是某些自視高雅的士人，常以「遊道」為名，將當時的旅遊風氣批評一番。這些將旅遊理論化或形而上的說法，可以說是一種消費品味的塑造，為的就是與眾不同。然而，「遊道」一詞，到了清代已少有人再提及，即使有，也未作深入的衍申或闡述，如趙士麟〈河陽遊記〉曾云，有友人多位有感於湖山佳勝，於是想趁春和景明之時共邀前遊登覽，他回答說：

予曰：「甚矣，遊之難言也！浪遊不律，限遊不適，燥遊不舒，忙遊不愜，閑遊不思，窮遊不澤，苦遊不繼，老遊不前，稚遊不解，富遊不都，勢遊不甘，官遊不韻，士遊不修，孤遊不語，便遊不敬。今之

¹³² 游山具前頭的上層，裝著銅製的貯藏茶葉與酒的「茶罐」與「酒罐」，以及一些文具等等；中層裝漆盆、茶盤等；下層裝飲茶與飲酒器皿。後頭的三層櫃子，上層放瓷盤，中層放各式食具，下層放燒煮用的鍋與盤等。外面還可以吊著瓢、竹簫、煙袋與數個蒲團。見〔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 12，〈橋東錄〉，頁 276。

所謂遊，則宜酌衷於數者之間，避所忌而趨所吉，釋其回而增其美。
遊道如海，庶幾乎蠡測。」¹³³

上述這段引文，是清人遊記中僅見論及「遊道」一詞的例子，但細觀其內容，其實是抄自明人王思任的〈紀遊〉一文，¹³⁴王思任原是藉以批評各種身分的人，如官宦、士人、富人、窮人；各類年齡層，如老人、青年人；以及各種形式的旅遊，如孤遊、托遊、便遊等等，都指稱他們有缺點，而趙文只是在次序上略作更動，文氣中並沒有像王思任及明代士人，常以「遊道」來批評時人旅遊風氣之意。

第三，就遊記的書寫作觀察，清代遊記中出現像晚明強調雅俗區分以及品味塑造的論述者，在數量上遠遠沒有下文提到以知識論述為主的遊記來得多。這都說明了清代的遊記不再像晚明那麼著重強調雅俗與品味。從清人遊記中的論述變化，我們可以發現另一種旅遊論述，也就是知識論述逐漸受到重視，甚至成了遊記論述的主流。下節擬從明清遊記中關於「古」的相關論述出發，嘗試理出一條脈絡，來探討明清兩代的變化與差異。

（二）從好古到懷古之風：明末清初的旅遊論述

在晚明文化界流行一股「好古」之風，這樣的風氣也波及到士大夫的旅遊文化。「古」是晚明士大夫旅遊文化中重要的構成元素，這可以從以下的幾個方面反映出來。首先就選擇旅遊地點時，凡是古蹟的所在地，往往成了士大夫旅遊的重點，王世貞(1526-1590)的〈遊攝山栖霞寺記〉就指出：「今天下名山大刹，處處有之，然不能兩相得；而其最著而最古者，獨茲寺與濟南之靈巖、天台之國清、荊州之玉泉而已。」¹³⁵可見旅遊勝地不只是有名而已，而且還要具備有「古」的條件。再如文徵明(1470-1559)說太湖的洞庭兩山之所以能成為

¹³³ [清]趙士麟，〈讀書堂綵衣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印，1997），集刊，別集類，冊 239-240，卷 10，〈河陽遊記〉，頁 2a-b。

¹³⁴ [明]王思任，〈紀遊〉，《王季重雜著（下）》（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頁 646-647。

¹³⁵ [明]王世貞，〈遊攝山栖霞寺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四）》，卷 15，頁 28。

吳中絕勝之處，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該地「多古仙逸民奇跡」。¹³⁶再者，晚明出版的許多旅遊知識相關的書籍中，也常見介紹名勝古蹟的記載，如《天下水陸路程》記載有吳王墓的古蹟。

其次，喜好旅遊的古人往往成了晚明士大夫效法的對象。在談到旅遊時，士大夫往往引述過去古人的行徑，如陳繼儒(1558-1639)在〈紀游稿引〉中指出：「昔昌黎遊華岳之巔，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為訣。王玄仲（按：應為王粲，字仲宣）登蓮花諸峰，至約寺僧以煙舉為信。古人之艱于游如此！」¹³⁷還有士大夫以古人的旅遊經歷作為自己的理想目標，如張維機在〈游西山記〉中也說：「余覽王梅溪（按：宋人王十朋）遍歷名山，多有題詠；宗炳每游疊崖秀川，必窮其幽勝；陶弘景性善山水，盤桓不能已；尚子平與北海禽慶，遍游五嶽。余慕其佳致，望高岩，瞰大澤，輒為賞心。」¹³⁸他欣賞古人游歷四方的經驗，也想要效法。敖英在《東谷贅言》也說：「古者士大夫閒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履，徜徉於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吊古以暢沖衿，如杜少陵之於錦里先生，清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¹³⁹實則這樣「託古」之說不但成為士大夫將其休閒旅遊活動正當化的說法，而且也進一步地肯定旅遊活動具有的正面功能。

在此舉一個明代士大夫喜遊古蹟的實例，據吳寬(1435-1504)對友人章廷佐的描述如下：

章君廷佐，金華之宦家也。少入郡學讀書，既長，慨然有四方之志。今年冬來游於茲，適其鄉之知友，一時皆在太學相見，敘契闊外，取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與之校讎問難，以考其學。暇則又相與上下山

¹³⁶ [明]文徵明，《文徵明集補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9，〈游洞庭東山詩序〉，頁1256。

¹³⁷ [明]陳繼儒，《陳眉公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史兆斗刻本影印，1995年），集部，冊1380，卷6，〈紀游稿引〉，頁18a。

¹³⁸ [明]張維機，《清署小草》（台北：漢學研究中心據明崇禎四年刊本景照），卷6，〈游西山記〉，頁63a。

¹³⁹ [明]敖英，《東谷贅言》，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叢書集成新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寶顏堂秘笈》本排印，1985）（以下略編者），冊88，卷下，頁7b-8a。

水間，尋古人遺蹟，以概想其事，蓋留連欵曲者。既閱月，而廷佐東歸之興作矣。¹⁴⁰

在士大夫的遊記中，也有許多記載到行程中所見之古蹟與古物，如鍾惺(1574-1624)的〈修覺山記〉記載到行程中見有「祠杜工部、李供奉、蘇端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讀。」而亭後數武為寶華寺，寺前有雙井，一井置一塔，「唐物也」。此篇遊記對古蹟與古物的記載特別詳細，甚至還介紹修覺寺前唐代留下來的一井一塔。¹⁴¹又如王思任(1576-?)的〈游嶧山記〉中，作者花了篇幅介紹該山的「古蹟」之最著者四處、「古刹」三處，以及其他多處的奇泉、名石等等。¹⁴²

從以上的幾個方面都可以看到晚明旅遊文化的「好古」之風；不過，這時遊記即使有一些關於古蹟或古物的記載，但都只是介紹性的，似乎並無太多感性的論述。晚明遊記中所顯示的好古之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實也是一種品味塑造的方式；也就是說利用好古的論述，來凸顯士大夫旅遊文化的特異性。

到了明清鼎革之際，遊記的論述出現新的變化。明清之際至清前期，帶有悲涼與感傷的遊記非常多，而且往往透過旅遊中所見到的古蹟與古物來反映，呈現一種「懷古」之風，並成了當時遊記書寫的主流。如錢謙益(1582-1664)〈游黃山記〉中提到黃山著名的景點之一慈光寺時，有一段感慨的論述：

當其時，兩宮之慈恩加被，四海之物力充牣，移兜率于人間，化榛莽為佛土，何其盛也！軍興日煩，饑饉洊至，鐘魚寥落，糠覈不繼，追鼓鐘于長信，數伽藍于雒陽，蓋不勝滄海劫灰之嘆焉。¹⁴³

在這篇遊記中，他把古蹟的過去與現在對立而觀，緬懷的是過去的盛況，感傷

¹⁴⁰ [明]吳寬，《匏翁家藏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明正德刊本影印，1967），卷39，〈送章廷佐還金華序〉，頁242。

¹⁴¹ [明]鍾惺，〈修覺山記〉，收入[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頁294。

¹⁴² [明]王思任，〈游嶧山記〉，《王季重雜著》（下），頁613-616。

¹⁴³ [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46，〈游黃山記序·記之六〉，頁1154-1155。

的是現在的殘破。

在這類遊記中選擇作為抒懷的古蹟，大多是明代的遺跡或是過去朝代轉換時的遺跡。特別多的是有關南京的遊記，因為南京曾是明朝的首都，又是江南重要的城市旅遊勝地，著名的景點甚多；所以清初有關南京的遊記中尤其可以看到這一種特殊的筆調，如王士禛於康熙 2 年(1663)在南京旅遊後寫的〈登燕子磯記〉一文，感慨地提到：「浦口之晉王山也，山以隋煬得名；東眺京江，西溯建業，自吳大帝以迄梁陳，憑弔興亡，不能一瞬，詠劉夢得潮打空城之語，惘然久之。」¹⁴⁴他在康熙 3 年(1664)遊雞鳴山烏龍潭諸名勝後所寫的遊記，特別是形容後湖的一段文字說道：

登塔望後湖，湖亦號昆明池，故明貯天下版籍之所。今網罟勿禁，夕陽頽澹，野水縱橫，中惟荷葉田，田千頃，鳧鷖將子，十百成群，唼喋波間而已。十廟皆在山麓，帝王廟尤荒闕，童監數人，眠於輦路，羸馬脫羈，齧草階下，為太息久之。¹⁴⁵

明朝後湖設有東西二庫，乃為存放載有全國賦役戶口的黃冊，為防火災所以有特別的規定，此外後湖的風景也是南京地區遊覽的重要名勝。而上篇遊記中特別關注於明朝舊地，又寫入清後風景依舊而人事全非，很明顯地反映出對明朝亡國的感慨。

這類抒懷式的旅遊作品，到了康熙朝以後漸漸少了，一方面是清廷對漢人的文化政策轉為嚴厲，尤其是文字獄的壓力。清初順治時期因為清廷忙著鎮壓南明與各地的民變，所以即使當時已有許多反滿與鼓吹民族意識的詩文，卻很少以文字獲罪。清朝的文字獄開始於康熙朝，為的是阻遏清初流行的反清復明的思潮。康熙朝最著名的案子，就是莊廷鑑《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這兩個案子都是因為作品中有眷念明朝的意識而遭人訐告或參奏。旅遊文學也可能致禍，最好的例子就是蘇州知府陳鵬年的案子，據《郎潛紀聞·初筆》的

¹⁴⁴ [清]王士禛，〈登燕子磯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四）》，卷 16，頁 9。

¹⁴⁵ [清]王士禛，《帶經堂集》，卷 42，〈遊雞鳴山烏龍潭諸勝記〉，頁 1a-b。

記載，陳鵬年任蘇州知府時，甚為巡撫張伯行所倚重，事無巨細，多與之裁決；當時的總督噶禮因江南科場案，與張伯行互參，遂遷怒陳鵬年，藉口鵬年所作的旅遊詩〈重游虎邱詩〉中有怨懟清廷的引喻，將該詩句句旁注後密劾參奏，欲將他摘印下獄，幸好聖祖康熙不為所動，命復其官。¹⁴⁶由此可見，宦遊時的旅遊詩都還可能成為文字獄的口實而遭殃，更何況明遺民的詠懷旅遊詩作。之後的雍正、乾隆朝，文字獄更加頻繁，對士大夫的影響自是不容忽視。再者，因為清朝政權漸漸穩固，經濟也漸復甦，旅遊風氣隨之恢復，產生的旅遊作品也就逐漸擺脫清初那種悲涼與感傷的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已經出現一些涉及到知識性考證的遊記，如顧炎武(1613-1682)早在〈五臺山記〉中就曾實際調查估計之後，考證過去有關五臺山基址的說法，「皆太廣遠而失其實。」又考證當地人以為北魏孝明帝初迎天竺僧攝摩騰即來居此山之說有誤，實則漢孝圖像之清涼臺在雒陽，攝摩騰一直居於洛陽。¹⁴⁷錢謙益〈游黃山記序〉指稱黃山有三十六峰，曾詳載於圖經，「學士大夫不能悉其名，而山僧牧子不能指其處，……自《山海經》、《水經》記三天子鄩，亦曰三天子都，地志家紛紛聚訟。」所以他的黃山之遊還帶有知識的動機。徐乾學〈遊普陀峰記〉中描寫他特別考證志書有關普陀寺寺門建置的記載，大都語焉不詳，而詢之寺僧亦茫然不能對，又無碑記可考。¹⁴⁸汪琬〈游姑蘇臺記〉中特別描述見到該地有方石中穿，俗謂吳王用來插旌旗竿；旁有數十尺石壁與矮松壽藤相盤絡，則像是一、二百年的古物。¹⁴⁹雖然這些遊記中的考證文字所佔的篇幅不多，並非全文的重點，也不是當時的主流，可是卻開啓了日後考證式遊記之風。

¹⁴⁶ 據陳康祺的考證，鵬年初為江甯知府時，為總督阿山劾罷，於是六遊金山，嘗以疊石為步困之，此詩或隱寄此事，與反清實無關係。參見〔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14，〈陳恪勤公虎邱詩〉，頁294-295。

¹⁴⁷ 〔清〕顧炎武，《亭林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刻本影印，1995），集部，別集類，冊1402，卷5，〈五臺山記〉，頁4b-6a。

¹⁴⁸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卷25，〈遊普陀峰記〉，頁23b。

¹⁴⁹ 〔清〕汪琬，〈游姑蘇臺記〉，收入〔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清光緒三年至十三年上海若易學排印本），冊16，頁126b。

(三) 從懷古到考古之風：清中葉知識論述的興起

1. 古蹟與史事的考證

清代士大夫的遊記中反映出對旅遊景點的歷史或當地古蹟的重視，並不亞於明末清初的士大夫，如龔煒〈少遊黃山〉一文提到他初遊黃山的目的之一：「欲尋訪古蹟，而樵夫無可詢者，既返，猶歉然也。」¹⁵⁰戚學標(1742-1825)〈遊石門記〉，聲稱該地過去是唐朝詩聖杜子美訪張氏隱居之處，又歷代名賢多遊歷至此，所以不可不往遊。¹⁵¹沈彤(1688-1752)〈遊豐山記〉中，提到他少年時讀韓愈之文後，知世間有所謂豐山者，而且還有許多神奇的傳說；待其「授經南陽太守何公官廨，至數日，泛覽《圖記》，乃知所謂豐山者，近在城北三十五里，可游覽，喜甚，遂以詰朝，挈壺載筆，從弟子積慶騎而往至。」¹⁵²

為何要為訪古而旅遊呢？葉燮在〈湖上吟序〉一文中清楚地指出，旅遊最重要的就是為了「遇於古人」，他賦予了旅遊訪古的正面功能，使得旅遊訪古不只是遊樂，還可以從中體會出歷史，所謂：「蓋嘗於荒榛蔓草，故宮舊苑，名賢憑寄之墟，摩斷碣，訪野老。百千年之陳蹟，恍然如或見之。」¹⁵³章學誠(1738-1801)在〈秋日泛舟濠上記〉一文中，特別對旅遊訪古提出一套說詞：「古人生平，見於記載詳矣，乃必藉夫壤土舊跡，以為企慕，則當日偶然寄託，精神流露，於是為真；而山林皋壤，又後人所以登臨俯仰，發舒志意，斯見古今人情不甚遠也。」¹⁵⁴雖然在明人的遊記中已可見懷古與好古的風氣，但是清代士大夫更進一步地、具體地將訪古視為旅遊活動中的要務，提高了訪古在旅遊文化中的地位。所以許多遊記中都陳述了作者特別重視的，不是景色的優美與否，而是古蹟或古物。

¹⁵⁰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1，〈少遊黃山〉，頁19。

¹⁵¹ [清]戚學標，《鶴泉文鈔》，卷上，〈遊石門記〉，頁47b。

¹⁵² [清]沈彤，《果堂集》，收入〔清〕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以下略編者），冊1328，卷9，〈記·遊豐山記〉，頁7b-8a。

¹⁵³ [清]葉燮，《己畦文集》，卷8，〈湖上吟序〉，頁23a-23b。

¹⁵⁴ [清]章學誠，《章學誠遺書》，〈秋日泛舟濠上記〉，頁219。

清中葉士大夫的遊記，花在描寫古蹟的篇幅相當多，他們對古蹟不只是欣賞，還會在遊記中引經據典，仔細地敘述這些古蹟的來龍去脈。如金之俊〈遊洞庭西山記〉指出林屋洞相傳通蜀之峨眉，他又查諸志書的記載，稱岱、嶽、羅浮諸山皆可通。¹⁵⁵劉大櫟〈遊晉祠記〉中亦引《山海經》指出晉水之源，並大談晉國、晉水與晉祠等有關的歷史舊聞。¹⁵⁶邵長蘅在其文集《青門簾稿》也有多篇遊記，花了大量篇幅在考證古蹟上，如〈盤山志序代〉就引述酈道元所稱來描繪望山的歷史與傳說。¹⁵⁷顧宗泰〈遊鍾山記〉詳細敘述鍾山自晉代以來刺使罷還栽松，以及山上的靈谷寺自梁武帝到明初的歷史。¹⁵⁸全祖望(1705-1755)〈平山堂記〉中，提到該地所保留之古蹟屢有變遷，但志乘記載卻不詳，於是他引據諸書大談平山堂的歷史。¹⁵⁹

有的遊記不但會援引各類史籍來驗證古蹟與史事的關聯，有時遊記中的作者還會搖身一變成爲考古學家，透過旅遊所發現的證據，來斷定或考證古蹟的年代。如武億(1745-1799)〈遊鞏縣石窟寺記〉云該地的石窟佛像林立，史書卻對其起始記載不詳，而作者赫然發現石壁之西有金朝所建的某像塔記，已云自後魏宣武帝景明年間開鑿爲窟，故作者據此斷定該地石窟佛像始建於北魏。¹⁶⁰

雖然明代的遊記中也記載了一些古蹟，明朝的士大夫在旅遊時也會把古蹟列爲遊覽觀光的重點，但卻不會在遊記中大篇幅地作考證。至清中葉，士大夫的遊記中就充滿了這樣對古蹟作詳細考證的論述，形成一波「考古」的風潮。考古風並不像清初的懷古風帶有任何感情，而是看似中性的、客觀的知識論述。其實這種風氣像前文所云，早在清初就已經可以看到一些先驅者，到清中葉更成爲一種流行的旅遊論述形式。至於這種論述之所以興起，原因頗爲複

155 [清]金之俊，〈遊洞庭西山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四）》，卷16，頁33。

156 [清]劉大櫟，《海峰先生文集》，卷5，〈記·遊晉祠記〉，頁31b-32a。

157 [清]邵長蘅，《青門簾稿》，卷7，〈盤山志序代〉，頁26b-27a。

158 [清]顧宗泰，〈遊鍾山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四）》，卷16，頁2。

159 [清]全祖望，〈平山堂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四）》，卷16，頁10-11。

160 [清]武億，《綬堂文鈔》，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2，〈遊鞏縣石窟寺記〉，頁37-38。

雜，和乾嘉考據學派、桐城文派，以及徐霞客的影響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¹⁶¹除了考證史蹟與史事之外，我們還可以從清人遊記中看到另外兩類常出現的知識論述形式：考證古物與考證歷史地理。

2. 古物的考證

我們從遊記中還可以看到清代士大夫在旅遊時很重視古物，而且對其所見的古物會發揮考據工夫，仔細檢視古物的年代與真偽。如王士禛在遊金陵鐘山與靈谷山時，見某廟殿前有巨鐵翦，鏤大「吳」字，當地人誤以為是三國赤烏時物，而他則考證說明太祖朱元璋初定建康時為吳國公，八年後才自立為吳王，此巨鐵翦應當是朱元璋尚未改元時所作的，實為明初之古物。¹⁶²潘耒〈遊羅浮記〉中提及其抵達廣州附近的南海神廟時，見有銅鼓二，他的考證結果是：「其一徑五尺餘，刻鏤精巧，青紅斑駁，扣之淵淵，是漢以前物；其一徑三尺許，聲質俱劣，宋時物也。」¹⁶³錢大昕〈遊茅山記〉記其經過廣惠廟，廟門石闔根有狀甚奇古的兩幅門神像，而神像旁寫有淳熙年月，所以他斷定此為南宋時物。¹⁶⁴朱筠〈遊采石記〉中考證采石磯附近當地人傳說的陳友諒砲台，其實是元代的古物。¹⁶⁵章學誠〈濠上後遊記〉云其步至文殊之寺，雖門徑荒蕪，卻有舊碑橫臥其間，正殿題額為康熙元年充祭告使光祿寺卿佟世器所書，然而題額中有許多錯誤，如祭告之「告」作「誥」，「卿」作「正卿」，章學誠考證

¹⁶¹ 限於本文之篇幅，筆者將另撰文探討。在此還要說明的是，清代中葉的遊記作品中，仍有不著重考據形式的書寫者。例如不以考據著名的才子袁枚，雖然在他的遊記中仍然可見他自陳旅遊時也有尋找古蹟之事，如〈戊子中秋遊記〉云：「今以一髮首故，得與群賢披煙雲，辨古蹟，遂歷歷然若真可記者。」在〈游丹霞記〉中描寫有僧人問其為何該地無古碑，他解釋道：「雁宕開自南宋，故無唐人題名；黃山開自前明，故無宋人題名；丹霞為國初所開，故并明碑無有。」但是袁枚的遊記風格並不屬於這類，他不會在遊記中花大篇幅在考據上。又如他的〈游廬山黃壩遇雨記〉中，云其遊至某地，見其旁堆積有石礎碎瓦礫無萬數，懷疑該地即是古大林寺之舊基，但有個輿夫卻說：「不然，此石門澗耳。」袁枚就笑稱：「考據之學，不可與輿夫爭長。姑存其說何害？」這篇遊記頗有諷刺考據學派的味道。

¹⁶² 〔清〕王士禛，《帶經堂集》，卷42，《魚洋文四·記》，〈遊鐘山靈谷山記〉，頁3a。

¹⁶³ 〔清〕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3，〈遊羅浮記〉，頁1。

¹⁶⁴ 〔清〕錢大昕，《潛研堂集》，卷20，〈遊茅山記〉，頁335。

¹⁶⁵ 〔清〕朱筠，《笥河文集》，卷7，〈遊采石記〉，頁8a。

此寫法皆有誤，故懷疑此碑乃假借侈世器之名而書者。¹⁶⁶

尤其是對古人的石刻碑文或題字特別有興趣，如潘耒在〈遊林慮山記〉注意到該山上的天平寺，在前朝為巨剎，而當時已荒廢，他在草叢間尋得一石碑，乃元人朱象先所撰的〈延壽宮記〉，由此可知該地原來還設立有道院。又在廢敝的沂山寺殿中，發現有元碑三，刻有護持詔旨，上層列蒙古字，下層列漢字，「辭盡俚語，譯者不略文飾，想見當時風氣樸實也。」¹⁶⁷姚鼐在其《惜抱軒全集》中的遊記，也特別多這樣的情形，如〈登泰山記〉中他描述到碧霞玄君祠時，所注意者並非神祠的建築形式或信仰活動，而是旁邊的古石刻：「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玄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玄君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¹⁶⁸錢兆鵬(1743-1820)〈遊燕子磯記〉中談到他遊金陵燕子磯附近，磯上有「漢前將軍」關羽廟，廟之南亭三楹，王士禛曾謂該壁間有題字叢雜，但他去時已無存者，有常州一老生還說十年前猶可見到。於是他歎云：「噫嘻！吳宮花草，晉代衣冠，吊古人不勝人事代謝之感，而況文人墨跡堪與江山共千古哉？」¹⁶⁹

有些士大夫旅遊的目的，就是為了蒐集這些古碑刻或題字，以作成拓本。如性好聚書，於金石刻蒐羅尤富的李文藻(1730-1778)，人稱其凡遇學宮寺觀、巖洞崖壁，必定停駐觀覽，而且會攜紙墨搨之。在其《南澗文集》中所收之遊記，幾乎都是記錄他一邊旅遊，一邊蒐羅文物之過程。¹⁷⁰其他的例子，如蘇州

¹⁶⁶ [清]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濠上後遊記〉，頁220。

¹⁶⁷ [清]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6，〈遊林慮山記〉，頁26b-28b。又他在〈遊鼓山記〉中特別注意到山頂有石刻「天風海濤」四字，係朱晦翁書，滄逸有晉唐人風格，而其他提名他看來則是不甚了了。見同書卷15，〈遊鼓山記〉，頁3b。

¹⁶⁸ [清]姚鼐，《惜抱軒全集》，卷14，〈登泰山記〉，頁169。他在〈觀披雪瀑記〉中也說，該地是「吾邑之奇也」，因為石潭壁上有刻文，「人前後觀茲瀑者多矣，未有言見北宋人題名者，至於余輩乃發出之。」參見同書，卷14，〈觀披雪瀑記〉，頁172。

¹⁶⁹ [清]錢兆鵬，《述古堂文集》（清光緒七年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古籍線裝書），卷8，〈遊燕子磯記〉，頁1a。

¹⁷⁰ 如〈遊南海廟記〉中描寫他到該廟旅遊後已手拓廟碑數十，其中得宋碑二、明碑六；更得意的是他到浴日亭看到陳白沙詩及蘇東坡詩各為一碑，過去關於此二碑有許多誤解，而他說：「今日之遊蓋為此」，也就是爲了要解決這些難題。事見[清]李文藻，《南澗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光緒刻功順堂叢書本印行，1995），集部，別集類，

府常熟縣人顧鎮(1720-1792)，在〈遊秀峰寺清玉峽觀瀑布記〉中稱其過萬杉寺，「聞寺中多古刻，亟訪之。」¹⁷¹又如查禮在〈遊逍遙樓記〉中記該樓創始於唐，有顏真卿書逍遙樓三大字，當世的書法家都會爭相搨之，而他旅遊的目的也是為「搨碑之陰陽二本以歸」。¹⁷²惲敬〈遊六榕寺記〉，記其尋東坡先生曾在此所留下的〈永嘉覺證道歌〉共四碑，卻只在塔之左發現其中的一碑，而其餘三碑不知沒何所。¹⁷³

這種情況絕不只是一、兩個士大夫的嗜好，工書法並擅摹唐碑及秦漢金石的钱泳，在其《履園叢話》中有一則〈秦泰山石刻〉，記載秦朝在泰山所留的石刻，到清朝只剩 29 字，但乾隆初年碧霞元君廟發生火災，就連此 29 字也都亡逸。巧的是嘉慶 20 年(1815)，泰安縣令蔣伯生賦閒無事，獨遊岱頂時，聽聞故老云：「玉女池中有古刻」，於是前往該處探覓，果然尋得殘石兩小塊，雖僅有 10 字，卻正是已經逸失的 29 字中的文字。於是蔣君搨數十紙，贈予海內博雅君子，一時傳為佳話。¹⁷⁴可見旅遊尋古人碑刻已是乾嘉時期的一種流行風氣。錢大昕亦鍾情於此，他在〈遊茅山記〉中云：「予此行本為訪碑，故山中名勝，所到不及其半。」接著他更指出這種活動的重要性：「予所見宋元石刻，又多志乘所不載，不及今表章之，後人將欲攷而無目，故記其所在，以諗後游者。」¹⁷⁵

3. 歷史地理的考證

第三類在清人遊記中常出現的知識論述形式是考證地理，尤其是歷史地理方面的考證。潘耒在〈遊羅浮記〉中細數該地所有的方志，從永樂時的《羅浮舊志》、嘉靖刊本的《續志》，一直到附有圖說的崇禎刊本《新志》；他根據

冊 1449，卷上，〈遊南海廟記〉，頁 15a-16b。

¹⁷¹ [清]顧鎮，《虞東先生文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據石山房叢書本印行，1994），集部，冊 130，卷 3，〈遊秀峰寺清玉峽觀瀑布記〉，頁 2b。

¹⁷² [清]查禮，《銅鼓書堂遺稿》，卷 29，〈遊逍遙樓記〉，頁 10a。

¹⁷³ [清]惲敬，《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 3，〈遊六榕寺記〉，頁 32b。

¹⁷⁴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九·碑帖〉，「秦泰山石刻」，頁 232。

¹⁷⁵ [清]錢大昕，《潛研堂集》，卷 20，〈遊茅山記〉，頁 338。

這些地理志，再加上自己的調查得出的結論是：「然吾觀羅浮二山橫互數十里，秀巖深壑，以千百數，浮在羅之西北尤大；而今《圖經》所載諸多名勝，皆屬諸羅，而浮則概未之及。」¹⁷⁶程瑤田(1725-1814)〈遊盤山記〉中，更是花了相當多的篇幅在探討流經平谷縣城的河流名稱：

立定光塔後，北望自來峰外，其下則平行數十里，平谷縣城在平地中稍西焉，隱隱有河自東來，逕平谷縣而西南流，按《水經注》：「洵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一、白楊谷。……洵水又東南逕平谷縣故城東。」蓋即此隱隱可見之河也。然所謂盤山水，乃盤山之陰北注之水，故在三十里之東遠望，見其自西而下，既下，乃折而北，故曰：「北轉注於洵水」也。讀酈《注》者不察，以為盤山之陽南注之水，遷就立說以附會之，所以終不可通也。¹⁷⁷

還有一些遊記的書寫方式就是參照地理書所寫成的，使得一篇遊記文體看似已經非常接近地理書志的內容，如朱書〈遊歷記自序〉就聲稱是「仿桑欽、酈道元以道里為經，以見聞為注，作《游歷記》若干卷。」¹⁷⁸劉大櫟在〈浮山記〉中，自稱此篇「全學自《禹貢》章法」，將浮山勝境五處直敘在前，如《禹貢》前並列九州；後敘諸峰脈絡次第，「如《禹貢》之有導山導水也」。¹⁷⁹又如浙江仁和人趙一清，博覽群書，尤其精於輿地之學，著有《水經注釋》40卷，刊誤12卷。在乾隆初，他與全祖望、沈炳巽三人並稱為名家。他的〈恒遊記〉實為地理考證之作。¹⁸⁰這種效法地理書的形式來寫遊記文，在當時應該是很普遍的情形，所以唐仲冕(1753-1827)就說：「記名勝山水，非熟誦桑《經》、酈《註》，不能象形；惟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圖於此文遇之。」¹⁸¹

176 〔清〕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3，〈遊羅浮記〉，頁606。

177 〔清〕程瑤田，《通藝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廣雅叢書排印，1989），總類，冊10，《水地小記》，〈遊盤山記〉，頁2b-3b。

178 〔清〕朱書撰，蔡榮昌、石鍾揚點校，《朱書集》，卷5，〈遊歷記自序〉，頁92。

179 〔清〕劉大櫟，《海峰先生文集》，卷5，〈記·浮山記〉，頁8。

180 〔清〕趙一清，《東潛文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據木犀軒叢書本印行，1994），集部，冊130，卷上，〈恒遊記〉，頁993。

181 〔清〕唐仲冕，《陶山文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浙江圖書館

四、結 論

近年來有關明清兩代的文化是連續或是斷裂的問題，明清易代之後是否阻礙了文化的延續，清人入關是否阻礙文化的發展而造成文化的斷層，成了學界討論的重要焦點。本文透過對旅遊文化的分析，嘗試探索上述的問題，而有幾下的結論：

一、中國旅遊史到晚明時，士大夫的旅遊風氣達到空前的高峰，這種風氣從明清之際到清初這段期間，因為戰亂受到阻礙而走向衰退。直到康熙末年以後，士大夫的旅遊風氣又隨著政治與經濟的穩定而再興，相關的旅遊書籍也陸續問世。由此可見，清廷入關並沒有完全阻礙了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發展。

不過，這並不代表清中葉以後士大夫的旅遊文化完全承繼了晚明的特色，因為晚明士大夫旅遊文化的一些特色，到了清中葉有的消失或發生變化，如晚明士人結社旅遊的現象到了清中葉就消失了，而晚明遊記中大膽描繪「挾姬」旅遊的文本，在清代士大夫的遊記中則變得隱晦不顯。另外一方面，清中葉士大夫的旅遊文化也有一些特點是明代沒有的，如自成一格的幕友旅遊，以及官場盛行的招待旅遊。

二、就旅遊活動的外在變化而言，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也有進一步的發展。晚明旅遊文化中所具有的商品化、娛樂性與舒適性的特徵，在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中仍可以看到這些現象。尤其在商品化方面，舉凡飲食業與旅遊業的結合、旅館的精緻化、更加專業的導遊出現，以及交通服務的商品化等，這些發展都較明代為進步。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物質條件的復甦，清代士大夫已恢復和晚明士大夫一樣，重視舒適性與娛樂性的旅遊。

至於如何評估中國旅遊的發展，就拿西歐最先進的英國作比較，我們會發現，在十六、十七世紀，英國旅遊還只侷限於少數貴族與士紳階級，旅遊的設備還是很落後；而晚明的中國已呈現相當進步的大眾旅遊，亦即士庶階層都熟

藏清道光二年刻本影印，1995），集部，別集類，冊 1478，卷 7，〈遊肥城牛山記〉，頁 36a。

中旅遊活動。¹⁸²但到十八世紀後期，英國在旅遊方面出現飛躍性的發展，許多旅遊相關的設施出現新的突破，如旅遊指南與地圖大量出版，里程碑與路標逐漸在各路間樹立起來，道路也因為採收費制而使路況維護良好；馬車在技術上的改革不但使速度加快，而且避震的車輪裝置使得乘坐者更覺舒適；客運馬車非常普及，甚至還訂出發車與到達的時刻表；至於英國的旅店更是歐洲人欣羨的地方，不但設備齊全，還提供許多服務。¹⁸³相對地，中國旅遊雖然也有發展，但是速度並不如英國，所以從英國使節團來華後的觀察顯示，中國雖在遊船畫舫以及旅館的普及方面仍具優勢，但是在陸上的交通工具以及旅館的設備方面卻已落後於英國了。

三、如果明清兩朝政權的轉移與異族統治等「斷裂」的表象之下，並沒有完全阻礙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發展，那麼從文化內在變遷的角度來分析，則顯示清人的遊記書寫與明人有截然不同的轉變。晚明士大夫遊記書寫中所呈現的雅俗區分與品味塑造的論述，到清代的遊記中雖然也有類似的論述，但是比重小，已不成為主流，可見遊記書寫正逐漸地發生變化。就以遊記中對「古」的論述脈絡來看，晚明士大夫的旅遊文化流行一股「好古」之風，清初士大夫的遊記內容則呈現一種悲涼的筆調，透過「懷古」的筆法寓意對明朝亡國的感慨。清中期旅遊文化再興，士大夫的遊記最明顯的變化是轉向知識性的「考古」論述，士大夫們常常在遊記中大篇幅地考證名勝古蹟的歷史淵源。晚明的好古可以說是一種文化品味的論述，清初的懷古則是政治意涵的表達，而清中葉的考古則走向知識性的論述。也就是說，清代士大夫愈加重視透過旅遊而獲得知識的重要性。這種遊記論述的內在變遷，反映了清代士大夫除了從事講究娛樂性

¹⁸² 參見拙作，〈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1(2003 年 9 月)，頁 109-110。

¹⁸³ 有關英國十八世紀旅遊發展的研究，最著名者莫過於 Ian Ousby, *The Englishman's England: Taste, Travel & the Rise of Tour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另外參考 John Brewer,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7), pp. 631-641; Hartmut Berghoff, Barbara Korte, Ralf Schneider and Christopher Harvie, eds., *The Making of Modern Tourism: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xperience, 1600-2000*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與舒適性的休閒旅遊之外，重視知識探索的旅遊風氣崛起，並逐漸成為當時的主流論述。這股潮流可能影響到晚清的經世之學。¹⁸⁴

有趣的是，當十六至十七世紀英國的國內旅遊(domestic travel)著重知識的收集，背後明顯地是受愛國主義驅使，或是擔負有經濟和政治的任務，而享樂主義與舒適性尚未被視為旅遊的主要目的；直到十八世紀中產階級茁壯之後，才有更接近類似現代旅遊業的想法。¹⁸⁵而中國旅遊文化的發展，在晚明是以享樂主義與舒適性為目標，直到十八世紀知識性的旅遊才成為主流。中西旅遊文化這樣歧異的發展頗耐人尋味。

¹⁸⁴ 如魏源主編的《皇朝經世文編》中蒐有張海珊〈遊說〉一文，其主旨即在強調旅遊對知識獲得的重要性。

¹⁸⁵ Hartmut Berghoff and Barbara Korte,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Tourism: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pp. 4-5, 9-10; Helga Quadflieg, "Approved Civilites and the Fruits of Peregrination," pp. 21-45, all in Hartmut Berghoff, Barbara Korte, Ralf Schneider and Christopher Harvie, eds., *The Making of Modern Tourism: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xperience, 1600-2000*.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民〕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四）》。上海：中華書局，1924。
- 〔民〕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五）》。上海：中華書局，1924。
- 〔明〕文徵明，《文徵明集補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明〕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
- 〔明〕吳寬，《匏翁家藏集》，收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以下略編者）。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明正德刊本影印，1967。
- 〔明〕張維機，《清署小草》。台北：漢學研究中心據明崇禎四年刊本景照。
- 〔明〕敖英，《東谷贅言》，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叢書集成新編》（以下略編者），冊88，卷下。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寶顏堂秘笈》本排印，1985。
- 〔明〕陳繼儒，《陳眉公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以下略編者）。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史兆斗刻本影印，1995。
- 〔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 〔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收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四部叢刊初編》（以下略編者）。
上海：上海書店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咸豐元年戴鈞衡刊本印行，1989。
- 〔清〕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
-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王士禛，《帶經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康熙五十年程哲七略書堂刻本影印，1995。
- 〔清〕王昶，《春融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1995。
- 〔清〕王漁洋，《香祖筆記》。台北：廣文書局，1968。
-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清〕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寫刻獨學廬全稿印，1995。
- 〔清〕朱書撰，蔡榮昌、石鍾揚點校，《朱書集》。安徽：黃山書社，1994。
- 〔清〕朱筠，《笥河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椒華吟舫刻本影印，1995。
- 〔清〕李文藻，《南潤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光緒刻功順堂叢書本印行，1995。
-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台北：明文書局，1985。
- [清]李紱，《穆堂初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道光十一年奉國堂刻本影印，1995。
- [清]李富孫，《校經廩文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刻本影印，1995。
- [清]沈世奕，康熙《蘇州府志》。康熙三十三年序刊本，國圖漢學研究中心藏。
- [清]沈彤，《果堂集》，收入〔清〕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以下略編者）。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
- [清]汪琬，《游馬駕山記》，收入〔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冊30，清光緒三年至十三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
- [清]武億，《綬堂文鈔》，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清]法式善，《陶廬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清]邵長蘅，《青門簾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以下略編者）。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青海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1997。
- [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姚鼐，《惜抱軒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84。
- [清]宣鼎，《夜雨秋燈錄》。濟南：齊魯書社，2004。
- [清]施閏章，《施愚山先生學愚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2。
- [清]查禮，《銅鼓書堂遺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查淳刻本影印，1995。
- [清]洪亮吉，《更生齋文乙集》。台北：華文書局據清光緒三年授經堂重刊本印行，1969。
- [清]唐仲冕，《陶山文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浙江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年刻本影印，1995。
-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冠山堂刻本影印，1995。
-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收入王英志校點，《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 [清]戚學標，《鶴泉文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五年刻本影印，1995。
- [清]捧花生，《畫舫餘譚》，收入〔清〕王韜輯，《艷史叢鈔》。台北：廣文書局據嘉慶二十三年刊本印行，1976。
- [清]梁章鉅，《浪跡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許奉恩，《里乘》。四川：重慶出版社，2000。
- [清]陳去病，《五石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清]陳用光，《太乙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浙江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三年孝發堂刻本印，1995。

-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據吳興嘉業堂對承幹刻本印行，1985。
- 〔清〕程瑤田，《通藝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廣雅叢書排印，1989。
- 〔清〕惲敬，《大雲山房文稿二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
- 〔清〕葉燮，《己畦文集》，收入俞子林等編，《叢書集成續編》，集部，冊124。上海：上海書店，1994。
- 〔清〕趙一清，《東潛文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據木犀軒叢書本印行，1994。
- 〔清〕趙士麟，《讀書堂綵衣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239-240。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印，1997。
- 〔清〕趙懷玉，《亦有生齋集文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道光元年刻本印行，1995。
- 〔清〕劉大櫟，《海峰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天津圖書館藏清刻本影印，1995。
- 〔清〕劉聲木，《萇楚齋隨筆五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57。
- 〔清〕潘耒，《遂初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康熙刻本印，1995。
- 〔清〕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清〕錢兆鵬，《述古堂文集》。清光緒七年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古籍線裝書。
- 〔清〕錢泳，《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
- 〔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清〕鐵保，《惟清齋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道光二年石經堂刻本印行，1995。
- 〔清〕顧炎武，《亭林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刻本影印，1995。
- 〔清〕顧鎮，《虞東先生文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據石山房叢書本印行，1994。
- 〔清〕龔煒，《巢林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

二、專書

- 〔法〕李 明(Louis Lecomte)著，郭強、龍雲、李偉譯，《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河南：大象出版社，2004。
- 〔英〕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香港：三聯書店，1994。
- 高 翔，《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 鄭 森，〈中國旅遊發展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 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
- Berghoff, Hartmut, Barbara Korte, Ralf Schneider and Christopher Harvie, eds. *The Making of Modern Tourism: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xperience, 1600-2000*.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 Brewer, John.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7.
- Clunas, Craig.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 Ousby, Ian. *The Englishman's England: Taste, Travel & the Rise of Tour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三、論文期刊

- 王汎森，〈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9 本第 2 份，1998，頁 245-294。
- 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周質平、William J. Peterson 編，〈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
-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1，2003 年 9 月，頁 87-143。
-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收入熊月之與熊秉真主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年 5 月。
- 巫仁恕，〈明清城市民變研究——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
- 李孝悌，〈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的情慾與身體：禮教世界外的嘉年華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2 本第 3 份，2001，頁 543-595。
- 陳建勤，〈明清時期的旅遊消費及其支出——以長江三角洲為例〉，《消費經濟》，2000 年第 4 期，頁 63-65。
- 陳建勤，〈論「游道」——明清文士旅遊觀研究之一〉，《旅遊學刊》，2000 年第 4 期，頁 64-68。
- Meyer-Fong, Tobie. "Making a Place for Meaning in Early Qing Yangzhou." *Late Imperial China* 20:1, June 1999, pp. 48-84.

Gentry Travel Culture in Qing-dynasty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Jiangnan Region

Wu Jen-shu^{*}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explore issues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gentry travel culture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I begin by showing that gentry travel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peak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but began to decline during the chaotic years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It took until the end of the Kangxi reign, when China regain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for gentry travel culture to reviv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while the Qing state did not totally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gentry culture, travel activities of Qing gentry did not fully inher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te Ming.

The second section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aspects of gentry travel culture, including scenic spots, lodging and cuisine,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utensils carried by traveling gentry, and so forth. My research points to a strong commercialization of tourism-related consumpti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hich proved relatively more developed than the late Ming despite the absence of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in most technological aspects. It is also clear that Qing gentry resembled the gentry of the late Ming period in placing great emphasis on comfort and travel for pleasure.

Third, a marked change in gentry culture may be found in the realm of travel writing, as seen 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vel notes composed during the high Qing and those of the late Ming. Some Qing gentry discourse about travel followed Ming models in stressing the contrasts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between gentry and commoner travel. However, this phenomenon was no longer mainstream, as discussions of the history of scenic spots became the dominant mode of travel writing during the high Qing. Such a trend might even have influenced the statecraft theories of the late Qing.

Keywords: Ming-Qing era, gentry, travel culture, Jiangnan, travel writing, discourse about travel